南方 人物周刊

刘小东
纽约疫情，我全程在场

本刊记者 蒯乐昊

P38 国际
卡洛斯的堕落
与西班牙王室存亡

P50 文化
马来巫师
张贵兴

P70 明星
HAYA乐团
从前有个地方
叫草原

P24 社会
张玉环
从凶手
到无罪的27年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南方周末 出品
ISSN 1672-8335
扫一扫即阅读电子刊

定 价：人 民 币 10 元 港 币 20 元 总 第 642 期 2020 年 8 月 17 日 第 24 期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CN44-1614/C www.nfpeople.com

南方周末

2020 CSR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

第十二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
获奖名单

2020年度责任先锋



钱小军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
经管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绿色经济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汪 勇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分部经理、
2020“五四奖章”获得者



项 兵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薛济萍
中天科技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笔畅
音乐人、Begins To Love
公益品牌创始人

2020年度战疫先锋企业

- 爱康集团
- 恒大集团
- 欢聚集团
- 劲牌有限公司
- 金域医学
- 蓝帆医疗
- 立白集团
- 腾讯
- 万达集团
- 碧桂园
-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 学而思网校
- 雅居乐集团
- 伊利集团
- 招商银行
- 中国奥园
- 中国平安
- 卓尔控股

2020年度战疫优秀案例

- 丁香园 · 丁香医生-疫情实时地图
- 帝斯曼中国-提升免疫力，共抗疫情
- 肯德基中国-“抗击疫情，爱不打烊”
- 旷视科技-明骥AI智能测温综合解决方案
- 蒙牛集团-蒙牛驰援全国抗疫

2020年度新锐责任企业

- 爱库存
- 度小满金融
- 好医生集团
- 联储证券
- 荣盛发展
- 完美世界

2020年度杰出责任报告

-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 五粮液
- 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20年度典范责任企业

- 百威中国
- 上汽通用汽车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 中国平安

2020年度责任案例

- 爱茉莉太平洋中国-妆典生命·两癌筛查
- 北京国资公司-梁家庄村脱低帮扶行动
- 福特中国-更美好的世界
- 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安全寄递直到最后一公里
- 浦发银行信用卡-浦绘童梦
- 星河湾集团-连南教育扶贫
- 阳光保险-“双生计划”扶贫公益项目

2020年度绿色发展企业

-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 华润置地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三生（中国）
- 台达集团
- 通威集团
- 兴业银行
- 雪松控股

扫码了解责任年会详情

南方人物周刊

2020年8月17日 第24期 总第642期

www.nfpeople.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 440100190045
价格 定价10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主编 王巍
副主编（常务） 杨和平
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卫毅
编辑部主任 周建平
总主笔 蒯乐昊
高级主笔 徐梅 徐琳玲 邓郁
主笔 李乃清 王燕青 黄剑
资深记者 张明萌 邱苑婷
记者 陈洋 王小祥 张宇欣
孟依依 赵蕾 杨楠
编辑 孙凌宇 杨静茹
首席摄影 姜晓明
高级摄影 大食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资深图片编辑 郑洁
资深校对 赵立宇
资深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邮编 510601
传真 020-87370368
E-mail renwzk@163.com
北京联络处 13910128123
上海联络处 13661513938
广州联络处 020-87371912
成都联络处 028-86981533

本刊部分图片由Getty / VCG / IC / Fotoe / Panos/ Osports提供

总经理 姚伟新
副总经理 孟登科 杨子
总经理助理 王海荣 袁宇 李佩佩
特别顾问 杨昌玉

运营中心华东区总经理 王海荣（兼）
成员 董一扬 王理晖 张艺颖 徐斌 金沈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婷
副总经理 邓媛元
成员 张津阁 于琦 过申祥 刘晓梅 王婷婷 张浩森

运营中心华南区总经理 袁宇（兼）
成员 廖颖 韦秋萍 陈晓微 余希桐 张力
梁嘉敏 江喜 柯晓露 徐子敬

运营中心西南区
成员 李勋 曾宪实 侍玉宝

品牌中心
总监 李佩佩（兼）
成员 凌亚 林周 黄河颂 魏运星 蓝鑫焱 王琳
郑永金 陆谢涛 刘籽欣 肖亮

全媒体服务中心
总监 谢仉辉
成员 **华东** 刘璇 邱晓艺 钟楚楚 董颖 洪梦玥 朱奇瑞
华北 陈婷 任亚强 王明明 裴益玄
张薇 刘畅 赵宇川
华南 袁斌 何倩仪 莫燕 刘烨
黄垚瑶 吴双 况娟
西南 高杲
商业内容小组 柯玉圆 郭莹 曾晓君

销售管理部
总监 黎文渊
成员 **华东** 张思韵 **华北** 项子琪 **华南** 刘金鑫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崔泽华
网络总编辑 肖华
首席技术官 蒲凡

内容部 **副总监** 陈雅峰
技术部 **总监** 张础杰
运营部 **总监** 吴水洁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金城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阅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7385907 **北京** 010-59540392
上海 021-20357389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沈阳：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大连环渤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吉林东联传媒有限公司 15004317981
郑州：河南宏达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371-86063992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烟台：海天书店 13205351986
石家庄：石家庄兵行天下书店 13613319399
成都：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3333009
重庆：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尚和书店 023-8635961
昆明：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
贵阳：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尚和书店 0351-7088915
南宁：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柳州：尚和书店 0772-3180862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82430796
武汉：明知书店 027-85497847
长沙：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尚和书店 0731-84411600
合肥：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温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江苏省邮局：025-8540671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029-87415811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500-1000元/千字；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1500元/张以上；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020-87001145
E-mail yjynfzm@126.com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人物周刊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n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npeopleweekly

官方APP 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本册印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CONTENTS 目录



12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刘小东
直到目前，纽约疫情我全程在场

04 VIEWPOINTS 世界观

76 SUPPLEMENT 后窗

80 COLUMNS 专栏

封面摄影 李毓琪





24 SOCIETY 社会
张玉环
从凶手到无罪，被迫缺席的 27 年

34 保卫一座堤

50 CULTURE 文化
马来巫师张贵兴

56 陈志勇 为那些离开故乡的人

64 气候变化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存更具威胁
——专访《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38 INTERNATIONAL 国际
前国王因丑闻流亡，西班牙王室会垮掉吗？





42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后疫情时期的“提琴村”

70 STARS 明星
HAYA 乐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草原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很多事情并非一句“运气不好”就能概括

本刊记者 陈洋

这半年，因为频繁地做社会题，我对政策的关注明显增加。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白天刚刚研读过的政策和宏观数据，晚上陪家人看电视，听着新闻又能再“复习”一遍。相比做单纯的人物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是时效性选题的另一种回馈，所谓“时代注脚”的感觉会更直接一些。带着这样的视角去研究数据和政策，你看到的就不再是枯燥的条款和空洞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具体的行业，一个个特定的人群，以及背后立体的生活。

这次写深圳楼市调控也是一样。坦白讲，对于房地产，我之前涉猎很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买房也是近几年的事。对我而言，买房是给自己找个安稳的居所，愉快，但看房的过程，重复又疲惫。于是果断如我，排除前期云调研，实际从看房到付定金，我只花了两天。

虽然没有太多的投资经验，这段经历还是让我对这次选题的几个采访对象有了更深的同理心。比如刚刚落脚深圳半年，希望带着孩子在深圳开启新的生活，却在看房路上因政策调整而失去买房资格的李梦；比如因为房价上涨被不断推升预算上限，却一次次被业主“反价”，直到一觉醒来失去买房资格的方晨；比如花了几个月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四处奔波选房，因在新政出台后担心房价下跌，付出 5 万元违约金，也要将刚定下的房子退掉的艾米……

如果不是做这个选题，我可能很难去细致思考一条政策背后不同的人生境遇，事实上，你也很难想象得到。如果把新政所划定的限购政策看作在坐标轴上以某几个维度框定一个区域，你可以想象这个区域内无以计数的坐标点，每个坐标点都代表一种人生。

写稿子的时候我也会好奇，一条政策的制定背后斟酌取舍的过程。比如限购年限要设定为三年五年还是一年，该补哪个政策漏洞，补的力度应该多大，政策施行的时间究竟要定在哪一天，等等。政策的毫厘之间，决定了很多家庭的生活折线。比如失去资格后被迫租房，父母只有暂时和孩子两地分居；比如在限购政策前恰好卖掉了在深圳的唯一住房，没法再次买房，十几年的深户只有重新回归租房……确实，政策的出台，遏制了投机炒房，但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轨迹。

当然，一个稿子不应该只是宣泄某种情绪，如果读者看完故事，只是感叹一句“运气不好”，稿子未免显得单薄。作为写作者，我们在讲述被改变的生活轨迹之外，也需要去探讨政策出台的背景，为什么必须出台，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出台，等等。我们需要补齐情绪之外的不同视角，提供一些理性的解读。

一方面，政策的制定有很多掣肘的因素，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的特殊背景下，我们需要将财政、税收、疫情、产业等多重因素考虑在内。政策的制定也时常是在不断地权衡利弊。

另一方面，如果“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外部性，‘误伤’无法避免”，那么如何从过去的政策效应中吸取经验教训，让调控政策在未来更加及时科学精准；如何让城市在承担更多发展责任和年轻人梦想的背景下，提升治理的综合能力，或许是我们的稿件将这些个体故事和反思呈现出来的价值所在。

很多时候，作为个体，我们可以用“运气不好”的感叹来疏解情绪，作为政策制定者，却无法回避反思。

国家政权的阴暗面

马尔科·G在德国联邦国防军服役8年后，又在警察局工作了近20年。他是狙击手，同时也是是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刑事警察局的特种部队（SEK）的成员。如今，他因非法持有武器而被判缓刑。在对马尔科进行调查后，警察发现了带有消音器的UZI冲锋枪，以及大约4万发子弹。检察官指控他违反了《战争武器管制法》。这个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人现在被认为可能危及国家安全。这只是不幸的个案吗？凭借这种观点，政客们数十年来一直在淡化警察和联邦国防军中的右翼活动，以避免绝大多数正直的公务员受到公众怀疑。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至少在公众的印象中，这种所谓的个别案件正在增加。在德国联邦国防军中，新的右翼极端主义事件已广为人知，特别是在其秘密精锐部队特种部队的司令部（简称KSK）中。两年以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人们一直在困惑，到底是哪位警员从警察计算机中泄露了敏感的地址，导致他们收到了最严重的威胁性信件。《明镜》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联邦州和联邦政府在警务人员和警察候选人中统计出至少400次涉嫌右翼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活动。这个数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因为每一个不遵守《基本法》的公务员都是问题，而这些问题比想象中更为严重。



[德]《明镜》
8月8日



【英】《伦敦书评》
8月13日



【美】《名利场》
8月

米歇尔·奥巴马的扮演者

现年55岁的维奥拉·戴维斯在2015年凭借电视剧《逍遥法外》获得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奖，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黑人女性。2017年，她又凭借电影《藩篱》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2020年，她将在新剧《第一夫人》中扮演米歇尔·奥巴马，这部剧集的制作公司属于戴维斯和她的丈夫。《第一夫人》每集一小时，会聚焦美国历史上第一夫人们的私人和公共生活。首季确认的主角已包括埃莉诺·罗斯福、贝蒂·福特和米歇尔·奥巴马，还有两位第一夫人有待揭晓。迄今为止，维奥拉·戴维斯赋予所饰演的每个角色一种奇妙的力量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她的童年。作为6个孩子中的第五个，她在一个父亲酗酒并偶尔有暴力倾向的环境中长大，经济窘迫的家庭甚至负担不起买肥皂的钱，她经常饿肚子，压力导致她到14岁仍然会尿床。但她没有放弃对舞台表演的爱好和天分，先后在罗德岛大学和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戏剧艺术，最终在电影表演上大放光彩。

英国脱欧是一场歌舞伎？

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莫拉维切克在《金融时报》撰文称，此事“形式感十足却纯属故作姿态”。4年后的今天回头看，简直没有比这句更贴切的描述了。在换了三任首相并和欧盟进行了多轮的谈判之后，涵盖英国和欧盟之间未来关系任何一方面的协议，目前依然不见踪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在英国北爱尔兰地区和爱尔兰共和国的边境检查问题上，设立某种形式的检查措施几乎不可避免。这些都和首相约翰逊之前的承诺大相径庭。事实上，欧盟的立场要比预想的强硬得多，与它此前和加拿大、挪威谈判自贸协定时的宽厚态度截然不同，显然，欧盟是拿定主意要给英国好看。比如在渔业问题上，欧盟坚持要保留进入英国渔场的权利，拒绝就捕鱼的配额进行年度谈判，而是要签署永久协议。而渔业问题在英国国内非常敏感，政府很难妥协。此外，在英国企业进入欧盟的准入问题上，欧盟设置的门槛也比对加拿大企业的要求严格得多。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白俄罗斯明斯克，军队士兵在演练中

俄罗斯雇佣兵出现在兄弟之国?

朱江明

近日，白俄罗斯官方发布消息说，33 名企图在白总统选举前进行破坏活动的俄罗斯籍雇佣兵，当天凌晨在首都明斯克郊区和南部地区被逮捕，他们隶属于著名的“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官方声明中提到，一伙俄罗斯人 27 日入住明斯克郊区的一家疗养院，疗养院管理人员发现这些人行为举止及着装异常后报警。随后白安全部门包围了这家疗养院并逮捕了 32 人，另有一人在南部被捕。这些武装人员正在接受调查。

有消息称，这些据说是雇佣兵的俄罗斯人，只是在白俄罗斯转机，但是错过了航班，他们原本的目的地并非白俄罗斯。这一说法显然意在说明这些俄罗斯人并非奔着白俄罗斯总统选举来的，而是准备去第三国行事。由于疫情的影响，俄罗斯和很多国家已经断航，确实有一些俄罗斯旅客经白俄罗斯转机。

然而，白俄罗斯官方驳斥了这批雇佣兵系准备转机前往第三国的说法。负责调查这起事件的安全官员称，所谓从明斯克转机的说法根本就是借口，“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他们并不打算飞往第三国（指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是网络传闻的真实目的地）。”审讯过程中，被捕的俄罗斯雇佣兵中有 11 人称他们要飞往委内

瑞拉，15 人称要飞往土耳其，2 人称要飞往古巴，1 人称要飞往叙利亚，还有 1 人居然“不知道自己要飞往哪里”，剩余人员则保持沉默，拒绝透露目的地。

由于这 33 人口供对不上，所以，尽管普京亲自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沟通此事，人还是没有放出来。更糟糕的是，老冤家乌克兰现在也准备在背后插刀。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Dmitro Kuleba）表示，已经要求将这 33 名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引渡至乌克兰。因为这些雇佣兵中有一些人持有乌克兰护照，并且被确认参与了东乌克兰地区的武装冲突，所以乌克兰认为自己有权引渡这帮人回去受审。为了此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和卢卡申科通了个电话。

这事已经成为重大的地区安全事件，很可能影响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甚至整个东欧地区的局势。为什么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对于俄罗斯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的雇佣兵如此忌惮，甚至不惜跟俄罗斯翻脸也要扣留他们呢？

事实上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国力衰退，已经无法用军事手段直接干预周边国家事务，于是开始派雇佣兵执行地缘政治干预，其中包括哥萨克雇佣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雇佣兵的第一场战斗是介入了 1992 年的摩尔多瓦内战。摩尔多瓦是一个在罗马尼亚以东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于苏联解体后独立。摩尔多瓦的主体民族跟罗马尼亚同文同种，但在德涅斯特河沿岸部分地区，居民以俄罗斯裔为主，于是，这片地区宣布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摩尔多瓦政府认为德涅地区独立是叛国，于是开始了一场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内战。

实际上，德涅地区驻扎有效忠于俄罗斯的苏联红军第 14 集团军，但是叶利钦政府当时表态中立且禁止军队直接介入摩尔多瓦内战。于是，哥萨克雇佣兵闪亮登场，他们大多数有在阿富汗的战斗经验，而苏联解体后难找工作，于是开始了刀头舔血的军事冒险。由于作战经验丰富，武器装备在 14 集团军暗地支持下也非常强大，德涅地区成功保持独立（尽管没有国际承认，但是该地区完全独立于摩尔多瓦，直接听命于俄罗斯）。这种通过雇佣兵白手套实现地缘政治干预的手段，成为此后俄罗斯对前苏联地区加盟共和国的秘密行动范本，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的内战中，都可以看到俄罗斯雇佣兵的身影。

车臣独立运动开始的时候，莫斯科情报机构也曾经试图以雇佣兵解决问题，然而，由于车臣独立武装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雇佣兵的行动彻底失败，其后，俄罗斯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也进行得异常惨烈。由此可见，雇佣兵只能胜任一些低强度的武装冲突，真正遇到硬核对手，还是棋差一着。

此类经验和教训让俄罗斯逐渐摸索出一套奇正结合的战争手段，也就是所谓的混合战争。2014 年，俄罗斯迅速策动克里米亚独立就采用了典型的混合战争手段，不仅动用了正规军事力量和雇佣兵，同时还发动了宣传战和网络战，并且大量散播自相矛盾的假消息进行信息污染。这些混合手段使得刚刚上台的乌克兰临时政府无法做出正确决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克里米亚半岛独立后公投且并入俄罗斯联邦。其后，俄罗斯通过雇佣兵和秘密行动的正规军，又在东乌克兰地区策动了顿巴斯独立运动，整个剧本可以说就是放大版的摩尔多瓦内战。

在乌克兰配合俄军行动的主力雇佣兵公司，就是本次多人被抓的瓦格纳集团。这家公司可以说是俄罗斯政府使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准军事力量，在前苏联地区干了不少业务，在中东、非洲、南美洲也都有其活动的身影。至于这次在白俄罗斯失手的 33 人到底去哪里，要干什么，恐怕现在还很难有定论。

黎巴嫩

8 月 6 日，贝鲁特，一位受伤的市民坐在受损的家中，望着爆炸过后的港口区。贝鲁特港口区 8 月 4 日发生剧烈爆炸，导致 160 多人死亡、六千多人受伤，数十人下落不明，大约 30 万民众无家可归。

图 /Anwar Amro

编辑 方迎忠 郑浩 rwzkphotos@vip.163.com



波兰

8 月 5 日，卡托维兹，2020 环波兰自行车赛第一赛段冲刺阶段，快步车队的法比奥·雅各布森（左一，栏杆挡板后）被珍宝车队的迪兰·赫鲁内维亨（左二，着黄衣者）挤到边上，撞上挡板后重伤昏迷。
图 /Luc Claessen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在美墨边境写生，刘小东跟当地的警察局长成了朋友。这是他在警察局“体验生活”

刘小东

直到目前，纽约疫情我全程在场

他更愿意说的还是美国边境小镇 Eaglepass。他画警察局长，画他的家人和同事，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月。美国电视里疫情报道甚嚣尘上，但局长绝口不提这茬。等到全部画完，刘小东忍不住问他：你应该知道中国的疫情，为什么你还跟我一起喝啤酒？还和我拥抱？
警察局长耸了耸肩膀：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新闻是一回事，可是生活，我的朋友，生活是另一回事

本刊记者 蒯乐昊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在微信头像上，刘小东戴顶灰色呢帽，立领黑大衣，黑裤黑鞋，个子不高，像是黑帮电影里某个话少戏份却重的角色。在他前面，一条黑色的狗子松了拴绳，迫不及待要奔出去撒欢儿，已经领先他半个身位，于是他也紧赶着跑了起来——画面上，六条黑色的细腿腾空了五条，一切都在动态之中。

他曾经绕着地球到处写生画画，“哈瓦那就是一骷髅，背景是极其绚丽的蓝，美到你无法形容……纽约是黑色的，在那些摩天高楼下穿行，人就像走狗！”之前接受采访时，他这样描述过纽约。

但这依然是足够复杂而迷人的城市。对于刘小东来说，纽约有特殊意义，1993 年，他跟喻红在纽约结婚。他们穿着白西装白裙子，像一道拱门那样在纽约街头高举着牵手，脸上是压抑不住的英姿勃发，像被照亮了。这是纽约，走进这里，就是走进全世界的前厅。

2020 年，因为疫情，他被困在纽约，好几个月过去了，苦等不到一张回国的机票。陪在他身边的还是喻红，以及他们业已成年的女儿。

除了苦刷新闻，还能做什么呢？他以西村的居所为圆心、两公里为半径，在街头散步、拍照、画画。照片里的纽约街头曾经空无一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后来人们重新走上街头，带着口号、标语和他们内心的不平之气。他看经典美式情景剧《老友记》，冀望能够通过台词提高英语水平——《老友记》里那个象征着城市公共客厅的、名为“Central Park”的咖啡馆，也怀旧地折射出一个美好时代的旧日纽约。

市中心没有海岸线，阳光明媚的时候，New Yorker 们跑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裸晒，仿佛他们置身沙滩。男人脱掉上衣，女人只着比基尼。大片高饱和度的樱草绿之上，白人和黑人的不同肤色在太阳下闪闪发亮。他画下这一切，并想起马奈笔下《草地上的野餐》。然后他买菜，做饭，在唐人街，在超市门外，老老实实地排着安全社交距离的长队。

刘小东在疫情中画的这批小水彩，在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 举办了一场线上展览——线下展览暂时是没戏的，在街头抗议运动之后，许多沿街的店面都用木板牢牢封住了橱窗，从下城一直延伸到中城，这其中也包括画廊和艺术机构。



1

1 疫情期间，刘小东以西村的居所为圆心、两公里为半径，在纽约街头散步

2、3 2020空无一人的春天

“如果你们跳过那堵墙，我就会抓你们”

“纽约的这次疫情，到目前为止，我全程在场，一天都不差。”

一年前，刘小东接受了美国达拉斯当代美术馆的一个项目邀约，要在美墨边境“特朗普起墙的地方”，做一些关于边境主题的创作。当时他走访了得克萨斯州的美墨边境线，筛选出不少适合创作的对象。

“在达拉斯，紧挨着边境有个小镇，名叫Eaglepass，也就是‘鹰飞过小镇’，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警察局长，他非常友好，我想画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身边的一群警察朋友。当时我跟他约定：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会再来，来画你们。他说：那太好了，我等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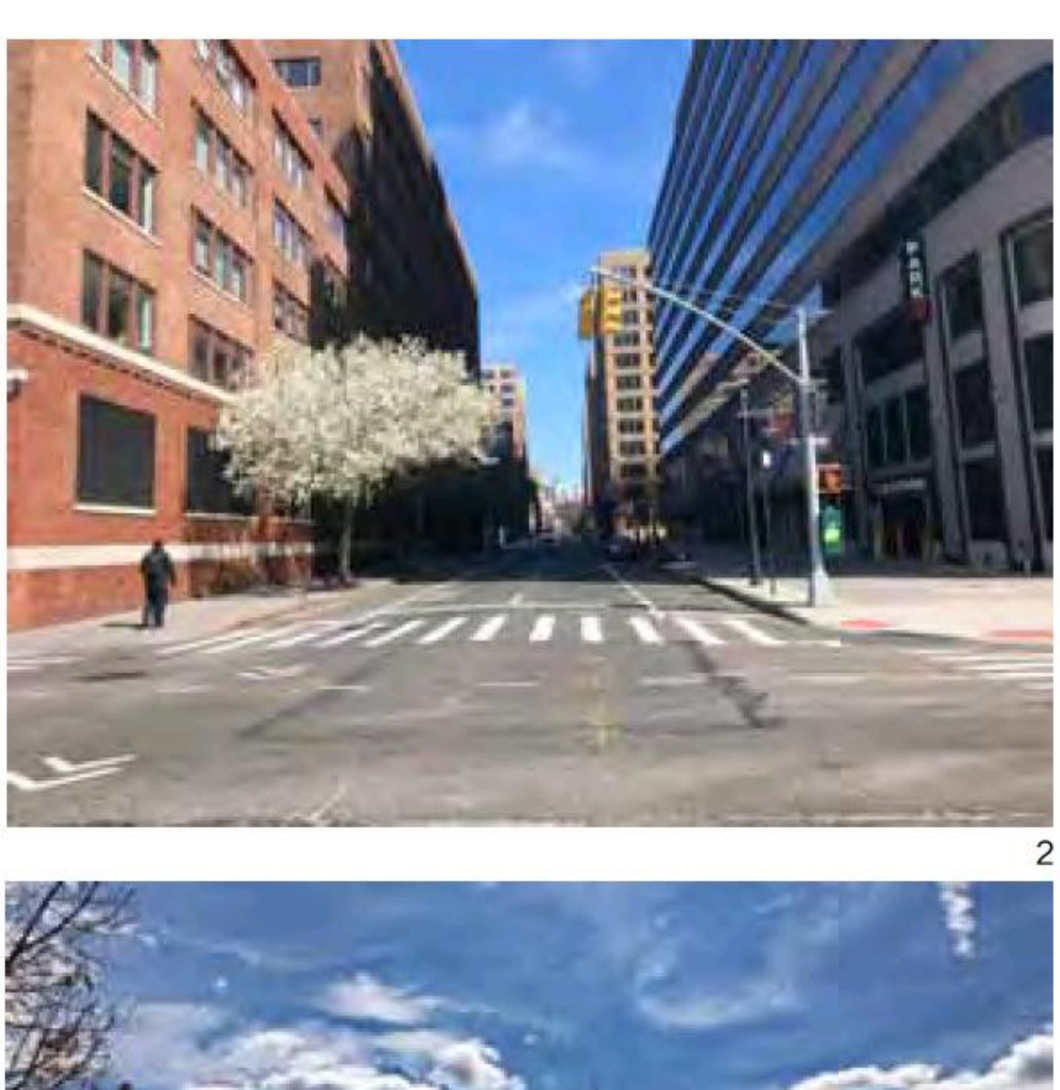
2020 年 1 月 28 日，刘小东从欧洲抵达美国，来实践自己一年前的诺言。他没能预判到的是，当时中国国内已经开始暴发疫情，武汉也在五天前实施了严格的封城令。

鹰飞过小镇的警察局长和他的朋友们对疫情心知肚明，电视机里每天同步报道不断，但是他们中谁也没提这事儿，依然对刘小东敞开怀抱。“当地的警察系统都是民选的，包括警察局长，都得参加竞选，由当地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美墨边境警察主要的职责是抓捕非法移民，法律很细

致，只要没有正当签证，偷越国境的，一旦被他们抓住，都会收到监狱中管理起来，他就是那里的监狱长，但同时他也是小镇的治安官。”

这位警察局长本人就是墨西哥裔混血，他爷爷是德国人，奶奶是墨西哥移民。他在媒体上很明确地对那些试图偷渡的难民表态：我同情你们，我也欢迎你们，但是如果你跳过那堵墙，我就会抓你！这是我的职责。”

这种复杂性，在美国社会俯拾皆是。在后来“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常常能见到黑人警察不得不面对白人示威者的挑衅，因为白人要表达对黑人的支持以及对警察系统的愤怒。这种让大洋彼岸的看客感到匪夷所思的戏剧化场面，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无比自然的，也是美国价值观高度多元细分的一个例证。



2



3

在达拉斯周边画了一个多月，刘小东跟家人来到纽约，原本计划短暂停留，就在这时，纽约疫情暴发了。

“突然之间就断航了，中美关系也变得有点谁也不服谁那意思。旅行社跟我说，整个 3 月都没票，4 月有没有票得排队。我还老觉得我是经历过 2003 年 SARS 的人，在我印象里，这种事一到天热就好了，最多仨月俩月就过去了。我怀着这个打算，跟他们说，别太急，就这么先排着吧。”

他连病毒的名字都记不住，一开始老往 SARS 上想。美国人一度管这个新病毒叫 SARI，听起来像 SARS 的同胞兄弟，后来改口叫 Novel Corona Virus，再后来又改名叫 COVID-19。“直到 3 月 15 号之前，纽约人还互相约会，我有很多美国朋友：策展人、画廊工作人员、艺术家……我们还经常在饭馆吃饭，大家松松攘攘的，还那样，也没有太多谈论这事，所以疫情的名字，后来他们反复告诉我，我才记得叫科罗娜（Corona），听着以为是一款啤酒。”

空无一人的春天

3 月 15 日是第一个分水岭，美国颁布了一个类似“禁足令”的规定，明确规定了社交距离。那天刘小东去买菜，突然看见附近超市关门了。“外头天很冷，在美国第一次看到买东西要在寒风中排长队是很恐慌的。除非是年轻人去特别热门的夜店，平时没有排队这回事。”排了半个多小时才被放行进超市，就想着得囤点货，超市里食物还丰足，但是手纸柜台全部是空的，洗手液也全部是空空的。

后来他画出了这种尴尬。抽水马桶上，放着一卷硬邦邦的、颗粒感很强的厨房用纸——用也能用，只是界面不那么友好。

唐人街的华人最早戴起了口罩，其他片区的人不戴。“美国的社会道德，他首先理解口罩应该是医务人员的装备，你现在没病你戴口罩，你就是在抢夺医护资源，如果你有病，你就更不应该出来晃悠了。美国人基于这种日常生活习惯，加上他们的民族性，不愿意戴口罩。”



1



2



3

1.《Hudson Avenue（哈德逊大道）》2020
2.《Twin Sisters（孪生姐妹）》2020
3.《Thank you（谢谢你）》2020
4.《Children'sPark（儿童乐园）》2020
5.《NYU（纽约大学）》2020
6.《SoHo（苏荷区）》2020
7.《East Village（纽约东村）》2020
8.《Hudson River（哈德逊河）》2020



4

他在纽约画的第一幅水彩，是阳台前的一棵大树，那是他从窗口看出去的景象。“那张画得比较乱，疫情突然就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也不甘心画水彩。我一直画很大尺幅的油画，突然被逼着困在家里画小画，心不静，所以那张画里有骚动和不静。可是画了两张之后，我静下来了。这个时代告诉我说：眼下这种糟糕的状况不是一两天能结束的。那我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无聊的室内生活？”

他想到的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坐在屋里看屋外，看看能不能把每个窗口都如实地画下来，然后拼接在一起。就像希区柯克电影《后窗》里的男主人公，腿既然瘸了，足不能出户，那么窗外就成为值得用望远镜细细探索的世界。

“我可能一天画不完，我今天画一个窗口，明天画一个窗口，用时间换空间。我在美国出门不方便，朋友不能往来，反而我就撑长了每张画的时间，越画越专心，越画越享受这个方式，在小画上的一点点，都慢慢找到趣味，今天找到一点，明天找到一点。”

他的这批小画，都是集中在 4 月 4 日到 6 月 13 日之间画的。疫情稍微松动些，他就出门四处去走，去看，美国街头不便写生，他就拍照下来回去画，一天画四个小时，还画不完，第二天再去看，去捕捉同一个地方在不同时间

段里光线和色彩的变化。那是照相机不能敏感还原的，得依赖绘画者的肉眼。

这种绘画方式，直接导致了这批作品在画面上的变化。以往他很少专门画水彩，水彩往往是在油画的项目和项目之间，作为一种补充，类似小品。“那样的水彩我一天能画两三张，创绩效，作为草图性质，也很活泼，有松有紧。但这次不同，这次所有的紧张都在一张小画上。”

有一张比较标志性的作品，画的是喻红和女儿刘娃在码头边，母女俩戴着口罩分坐在两张长椅上，刻意保持着社交距离。“那幅我画得很细，包括喻红头发飘起来的样子，椅子上的投影，椅子缝里露出外面的海水，以及码头上一行英文字：I WANT TO THANK YOU。后面的吊车，远处的楼房，天空里的云彩，全都画得很细。我觉得一点点描绘眼前和眼后的小小细节，就使我非常非常充实地度过了每一天。”

他也直接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上画画，照片是纽约街头的空镜，他给这死寂的街道添上个把行人：正在执勤的警察，送快递的小哥，在马路正中跑步的双胞胎女孩，一对在街头漫步的默契老夫妻难以置信地驻足望向空无一人的大道，手里牵着两条分道扬镳的狗。在远景处，他画出雪白的满树繁花，像雪花误会地飘进了春天，也像白色的焰火。这些花开得比任何一个春天都更耀眼，更纯粹，因为失去了观众。

一开始，他把手机拍的照片送去连锁超市冲洗，很快，超市关门了。里森画廊帮他在网络上找到专业的打印机构，用无酸相纸打印好，供他作画。相比之下，这些画在相片上的作品不如他的纯绘画有感染力，但在此情此景之下，却似乎是一种更为正确的方式。

“纽约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拍到空的街景，比如熨斗大楼前面空无一人，平时是不可想象的、纽约历史上没有过的。所以这种方法比画水彩更可信。水彩可以你自己编，你可以画街景不画人，就变成空街了。但是照片，你骗不了。街上确实没人，那些人都是我画上去的，我画人物就为了凸显街的空旷，如果不画人的话，这些照片一点意思都没有。无数人拍街景，你必须主动地改变



5



6



7



8

一种滋味，改变一种联想的方式，使这条街更加困惑。”

“我只负责方圆两公里之内的偶遇”

他确实怀有一种外来者的困惑。5 月底街头抗议活动开始起来，到 6 月初，纽约宵禁。他画过街头抗议的场面，但是他连自己到底是这场游行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不断质疑。

“因为你了解的信息不足以让你做出判断。比方说他们砍掉了哥伦布雕塑的脑袋。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当然很愤怒，但是你也不确定当时哥伦布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因为移民时代的需要，是被策略性地塑造出来的伪英雄？他真正的历史是不是有那么伟大？他是不是真的屠杀或奴役过很多当地人？这些东西辩论起来很复杂，很多知识也不是我能够迅速补课的。”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力求客观的姿态，早就规定了他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快速站队是不科学的，有时候，甚至是不道德的。

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撕裂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幸好我们家人口不多，就三口人，我跟喻红时代背景一样，那没意见，没有什么相左的。跟闺女之间的沟通就有点……她是在美国读的本科，比较讲求思辨性，美国教育比中国教育讲逻辑，说话不够严密很容易被击破，所以我们之间的观点矛盾，也就是一个严密的思辨之人，和一个不严密的情感之人的矛盾，大部分也没什么。”

刘小东说，他自己所有的艺术观点都建立在客观和人性的基础上，这是生活教会他的两个重要原则。为了客观和人性，他就只能维护他自己看到的这些，而不是随便同意新闻里说的那些,或别人看到的那些。他和他的疫情创作，只能代表在他居住范围附近两公里内的真实。

“抗议游行我只参与过一次，是在白天。很简单，你事先不知道他们要在哪儿游行，网站上可能会公布，但我也懒得查，我不勉强，我不是一个记者，我只是在我步行两公里以内，碰



《At my Doorstep（此刻此门之外）》2020



上了就看一眼，碰上什么我就画什么，我不负责整体的社会观察，我不承担记者责任。我并不是担心安全问题，我对这种街头活动有经验，我知道哪怕是在抗议冲突最危险的地方，你隔开半个街口，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我家附近的抗议活动没那么严重，可能华盛顿或西雅图会严重得多。打砸抢大多是晚上，纽约白天的游行大家都排着队，还是有秩序的。从我周边两三公里内的观察来看，我的真实感受是，再大的灾难面前，美国还是以自由为主。就算纽约宵禁了，你要出去散步，也没人敢抓你。只要保持社交距离，哪怕你是一家子，你别搂搂抱抱地散步就行。我周围的两三公里内并没有因为自由走向失序。美国的商店基本都有保险，那帮小子们砸完店，其实商家损失不大。美国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他们社会的一个自由度，躁动的年轻人就这样，平时过年过节也这样。在文明和法律的界限边缘，如果这口气不让他们发出来，那么就更难治理。他们所理解的人性的自由，是我自己犯的错误我可以负责，但是你没有现场抓获我，我就可以请律师说我不承认。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社会，一方面他们的疫情严重成这样，另一方面他们依然不愿意失去自由。”

“碰上了就看一眼，碰上什么我就画什么”

如果机器足够诚实，它就有动人的力量

以绘画见长的刘小东，可能是最不适合去颠覆绘画性的人。几年前，他却做了用机器臂绘画的艺术项目，用机器打破画家的不可取代性，打动他的就是对客观的追求。

“客观性不光是我对绘画的原则了，它也是我做人的一个原则。尤其在中国当下，常常有一种非常主观、煽情的风气，充满过度的激情，缺少客观的历史整体感。客观是我一直坚守的，至于艺术形式我觉得无所谓，不管我画画，做机械，还是我当一个老百姓，做人，发表演说，教学，和人相处，与朋友喝酒，最高标准就是别太滥情，客观一点，诚实一点。机器臂作画这个作品全做到了，机器可能比人更客观，这种客观性非常动人。这些新技术也鞭策我，随着年龄增长，不要萎缩，思想要开放一点，要不停地学习。”

这个名为《失眠的重量》的 AI 艺术项目前后持续了两年时间，每一秒都会有监控摄像头拍到的公共场所图像传输到美术馆或博物馆，再通过一支机械手臂描绘出这些形象。刘小东做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展览：第一个在上海的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在那里，他采集了北京、上海和他家乡东北金城的录像。第二个展览在



德国的新媒体艺术中心 (ZKM)，采集的是当地的监控录像画面，比如宝马汽车零件加工厂等。第三次是在韩国，做了两个个展，最终这个系列在伦敦的里森画廊完成，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韩国光州民主广场……这些带着鲜明地域标志意义的场景在这里完成定格，最终呈现出十余幅人工智能作品。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去找，摄像头放在哪儿，用什么色彩画，请工程师开始安装镜头，连接电脑手机开始画，为期多少天。如果画得太多了，我会叫展览方先停两天，等待颜料干，把控一下过程中的技术。结束的时候我到现场按停止键，然后在上面签名，那就是我的作品。”

虽然艺术家让渡了绘画权，但机器完成的依然是小东作品。机器不存在失眠问题，不在意观众的评价，也没有起义来讨要版权，它只是不知疲倦地如实描绘。“我都没想到颠覆绘画性，我从来不主动想这个事，这个世界就是来者不拒，但凡有质量的挑战都是好的。”

有质量的挑战是自己找上门的，来找他的人是他当年读中央美院附中时最有才华的张尕，“80 年代最有才华的，我指的就是英文特好，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都了解，在那个时候就有全球化眼光，有独特的思想。我少年时代就认为他是先锋分子，是我们学生里的领军人物。他找到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新媒体的艺术项目，我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刘小东说，学生里往往有两种领袖，一是听老师话的领袖，

这种大多是主流、正统的好学生；另一种是独立思考的领袖，他们有自己的见解和人格，连老师都忍不住对他们另眼相看，张尕就属于后一种。他与这位旧日同窗一起走访了清华大学的许多生物科学实验室，和科技工作者、工程师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半时间，才把机器臂作画的概念落地成可实操的现实。

半个北京人在纽约

陈丹青在许多场合讲过他跟刘小东的相识。1990 年，陈丹青在美国纽约一家书店看到《美术》杂志扉页上一幅刘小东的画，晚上回去就给刘小东写信。“我一辈子只有两次这样的经验，我见到这个人的一件作品，而且是这个人最初冒出来的作品，就认定这个人是天才，就跟这个人做一辈子朋友，其中一次就是刘小东。”在那幅画上，刘小东画的是自己带着女朋友回到家乡金城，一男一女站在墙角很惆怅的样子，是比较简化的写实作品。

刘小东 17 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陈丹青短暂地教过他们班一段时间素描。时隔多年，陈丹青早就不记得了。两个人热络地通起信来。三年后，刘小东第一次到纽约，出得机场，就看见陈丹青来接他。

这种惺惺相惜的往来一直未曾中断。2000 年陈丹青刚回国，受聘于清华执教，刘小东带着自己在央美的几个学生来见陈丹青，他对学生说：这才是大师。陈丹青马上调侃否认：我算什么大师，我中师，中师。

“我跟小东，起先我还算长一点辈分，多少还是个大哥，到 90 年代中期晚期，尤其是新世纪，我看他的画已经望尘莫及。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世界范围内，画人物那么好，那么有力量，我看不出现在活着的还有谁。我喜欢他生猛，非常生猛。单论写实人物油画，我不知道刘小东能否在当今世界同类画家中找到对手，他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艾瑞克·费舍尔。部分是因为小东的强悍特质，部分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写实人物画早已没落了。”说起刘小东来，陈丹青从来不吝赞美，当面说，背后也说。

1993 年刚到纽约的时候，刘小东住在布鲁克林，后来搬到上西城，然后又搬到东村。那时的布鲁克林还没有成为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只是因为房租便宜、交通便利而受到青睐。

90 年代的中国人正面临建国后第一波旺盛的出国潮，在此之前的 80 年代文化启蒙的思潮，似乎都为这种接轨做足了社会心理上的铺垫。

刘小东曾用“全盘西化”来形容在央美附中求学的四年。金城小子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大量西方艺术和理论。在他的回忆中，央美附中甚至比央美还要开放。不少同学都沉迷于西方文学和哲学，热衷于实验艺术。他们在阅读上狼吞虎咽，照单全收，“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西方人。因此后来才有那么多人强烈地要出国，拼了命地要出国。”

1994 年国内大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表现的就是这一代中国人试图融入世界的努力。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也以其独特的活力和包容性，让外来者冀望一切梦幻的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那是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期，大战的阴霾已远，冷战的帷幕落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孕育，只是当时身在其中的人并不知情。

但对于刘小东来说，恰恰是 90 年代到了纽约之后，他才逐渐修正了这种单向的激情，也意识到每个艺术家独特自我身份的不可取代。“我在出国前看到的纽约艺术，都特别大，特别张狂，特别极简、有力量。到了纽约之后，你看到他们的生活，你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只有生活才成为他言说的一个标准。那不是凭空捏造，他人的生活你无法复制，这反倒让我坚定了我要画跟我自己生活有关的绘画。纽约人在七八米高的仓库里画画，90 年代中国人住在集体宿舍筒子楼，连个大点儿的墙面都没有。”

纽约教育了刘小东，也为他破除了神话，毕加索再牛，跟金城小子也没关系。他是为了追寻西方而去的，却在西方的镜子里看清了自己。

“艺术原来都跟自己有关，而跟空想无关。整个 90 年代，我们开始描绘自己，无论是绘画、电影、文学都开始描绘作者自己，所谓‘作者电影’也是那个时候起步的，‘自我写作’也开始兴起，每个创作者都建立起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日常的尊重。这让我放松了我的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事在纽约都不是大事儿。”

描画作为普通人的自己，进而描画作为普通人的他者，这就是写实主义者刘小东的脉络，几乎是一条清晰的直线。无论是他后来在三峡、和田，还是在古巴、非洲、格陵兰、巴基斯坦、冰岛、泰国……他想画出接近“人类家谱”式的绘画——描绘具体生活，却在每个具体的不同里，窥见人的共性，文化差异放大了人与人的不同，可人类作为同一个物种却依然永远有沟通的可能。

“你为什么还跟我一起喝酒，跟我拥抱？”

27 年后，再次旅居纽约。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全世界的初出茅庐的家伙。纽约呢？好像也变了。个体有个体的生命周期，时代有时代的。

他学会一招新的沟通方式。女儿给他开了 Ins 账号，隔三岔五，他在上面发布自己拍的照片和绘画作品，看见粉丝一点一点涨起来，从几个人涨到三千多人，他感到喜悦，这些都是单纯被他的画面吸引过来的粉丝。在异国，Liu Xiaodong 这个极为普通的拼音名字，卸下了名人效应的光环。“你要是图片不好，他们还真不点赞，我现在 Ins 的美国粉丝已经完全超过中国粉丝了。”

他觉得这是健康、良性的社交媒体，大家都只发照片不写文字，语言太容易昭示立场和引起分歧，图片则纯粹得多。“微信朋友圈的优点是能看到不同观点碰撞，但各种激烈的意见多了以后，也容易变成一种江湖，像是很近的社会关系里的一种角色展示，有时还互带广告的形式。平时大家做展览，有人转发了，有人没转发，就开始互相有意见，慢慢地友谊的小船就翻了，这种社交就变得有点重，变得有点虐。添加的朋友多了，朋友圈却不见得扩大了，看的人越多，越不愿意发表意见。”

相比之下，Ins 轻松愉快，不用为任何转发负责，最开心的就是谁也不认识谁。他留心观察自己每张图片下面的点赞数，发现油画大于水彩，水彩大于街拍，看来粉丝们的点赞心理，也默默配置了难度加权。

什么时候能回到祖国呢？依然没有时间表。“五个一”的航班排不上，旅行社建议他转机两个国家，曲线回国。他想了想，还是算了。全世界都在疫情，万一中间在哪个国家卡住了，进退两难，不如老老实实等直航。签证即将过期。6 月份意识到自己多半走不掉的时候，他请律师向移民局提出了延长签证的申请。这一年，所有人都得重新学习与变化相处，美国人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如果秋天疫情不再复发，11 月之前总可以回国了吧？如果不行，那就得接着见证美国大选了。

幸好有这场线上展览，显得他在纽约的蜗居生活并非一事无成。“接下来还得虚度时光，就可以不那么心虚。”

在纽约，他唯一遭受过的可以称为歧视的，是在马路边被飞驰的汽车溅了一身水，司机明显是有意为之。他在日记里写道：“但愿他少年气壮，恶作剧寻开心。但我联想近期疫情时期，新闻里经常有排华滋事发生，也真想回头大骂，可是汽车早已飞驰不见，我甚至连车的颜色都没记住。算了，纽约小伙子，你开心就好。反正中国人的形象在今天也是遭人质疑的。老北京不也是瞧不上外地人吗？哪都一样。”

“因为疫情，美国总统一直在指责中国，美国老百姓看见一个中国面孔，他心里肯定是不舒服。但我在纽约并没有安全上的担忧。枪击你一辈子赶不上，车祸你一辈子赶不上，可是新闻里天天有。我如果活在新闻报道里，我也会很焦虑。但我全程在这里遇到的最大的一次



在美墨边境，跟Eaglepass小镇的警察局长在一起

危险也就是被溅了一身水。”

在全世界的地缘政治之下写生，他早已习惯了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一次在伦敦某个宗教场合作画，一位宗教信徒看见刘小东把自己和餐厅厨师画在一起，突然震怒。当时在场记录的还有一位很有名的英国女导演，本来很乐意接受拍摄的宗教信徒把她和刘小东叫到跟前，明确警告他们：我可以随时砍掉你们两个的脑袋！现在，把你们之前拍我的记录全部删除，马上就删！

“我不太了解他们的等级观念，可能把一位神职人员跟普通人画在一起，触犯了他们的禁忌，我猜是这样，当时甚至没法问，我们俩只能一个拿出照相机，一个拿出摄像机，老老实实，当着他的面，删光了所有影像。”

他更愿意说的还是美国边境小镇 Eaglepass。他画警察局长，画他的家人和同事，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月。美国电视里疫情报道甚嚣尘上，但局长绝口不提这茬。等到全部画完，刘小东忍不住问他：你应该知道中国的疫情，为什么你还跟我一起喝啤酒？还和我拥抱？

警察局长耸了耸肩膀：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新闻是一回事，可是生活，我的朋友，生活是另一回事。

（实习记者包莉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张玉环

从凶手到无罪，被迫缺席的27年

8月4日，江西省高院宣判张玉环无罪。在羁押了9778天后，这个曾经被认定为杀害两名男童的“凶手”，重获自由

本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南昌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8 月 4 日傍晚 18 时 40 分，张玉环穿着黑灰条纹的短袖 T 恤和黑色五分裤，胸前挂着一团红花，在媒体和村干部的簇拥下，回到了阔别近 27 年的张家村。

母亲张炳莲、前妻宋小女、儿子保仁和保刚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宋小女看到张玉环，扑上去抱住他。张玉环眼眶一下子红了，宋小女激动得晕了过去，被送往医院。母亲拉着他坐在新铺好的床边，颠来倒去地对记者说：“他受了好多苦，受了好多委屈。”

张玉环留着寸头，黑发，两颊肌肉已松弛，眼尾有了几道深褶。他已经年过半百，而当年离家时，他还只是个 26 岁的青年。

1993 年 10 月 24 日，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两名男童被害，其中，一名 6 岁的孩子被人用麻绳勒死，另一名 4 岁的孩子则被人用手掐死，随后被抛尸在村西北方的下马塘水库。时年 26 岁的张玉环被锁定为嫌疑人。经过长达八年的案件审理及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江西省高院”）最终裁定，维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昌市中院”）的原判，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2 年初，张玉环被转移至南昌市监狱服刑，期间坚持申诉，寻求平反机会。

2020 年 7 月 9 日，江西省高院开庭再审“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律师王飞、尚满庆称，张玉环此前两份有罪供述均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做出，属于非法证据，认定为本案物证的麻绳、麻袋，以及他手指上的伤痕，缺乏鉴定，不能证明其与本案的联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以“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物证不具关联性”为由，建议改判张玉环无罪。

法院虽没有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但在 8 月 4 日的宣判中，听取了检、辩双方意见，认为张玉环的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除有罪供述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间接证据亦不能形成完整链条，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判决他无罪，当即释放。

回家之后，张玉环面对记者，有点紧张，说每句话都会有短暂停顿，双手不停地抓裤子和胸前的团花。待母亲和儿子走出房间后，他怅然说道：“我已经认不出儿子和母亲，儿子长大了，母亲老了。房子也不认识了，一切新鲜得像坐飞机一样。”

“社会变化得太快了，现在我就跟傻子一样。手机我没用过，只在牢里见管教干部用，坐牢之前我有 BP 机。”他说。他仿佛从 1993 年穿越到现在。过去近 27 年的时光之路上，堆积了四五百封申诉信，脑子里的时间始终没越过 1993 年那个秋收季节。

秋收

张家村在进贤县城的东边，一条主路贯穿整个村子，直通南面的 523 省道。二十年里，这条路从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沥青路。村里的房子沿主路而建，鳞次栉比，一半是老式的红色砖瓦房，一半是新盖的水泥小楼房。村子里如今人已不多，只能看到老人，还有带小孩的年轻媳妇，很多人因为孩子读书和外出务工，陆续搬去了县城。



左图：和前妻宋小女及母亲张炳莲拥抱后，张玉环红了眼眶
右图：2020年夏，丰水季的下马塘水库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但田地没有荒。炎热而多雨的七八月之交，水田里的早稻刚刚被收割，晚稻的秧苗已经插了，等待着 10 月下旬再一次的收获。常年不在村里的人，也会记得家里的田地。

1993 年 10 月，张玉环从上海赶回来割晚稻。他是家中次子，小学时成绩不好，跟着父亲找的木工师傅学手艺，十三四岁就随师傅去福建做工。1990 年代初，他辗转于福建、上海两地接活，一年中，只有春耕和秋收时才回村里，干完农活，又匆忙离家。妻子宋小女有先天性心脏病，做不得重活，“他在田里做事，我坐在地上看。饭多半也是他做，他做得好吃，我不行，用大锅煮饭，明明煮好了，我还要扇一道火，就烧糊了。”

张玉环一家在村里算过得不错的人家，负担也少。村里人均日收入几元钱的时候，他因为常年外出做木工，一天就可能赚到十几元。宋小女说：“那个时候好多跟我们一起结婚的，分家时还要分到父母的外债，我们一分钱债都没有，还分到一只小猪。”

变故发生在收割晚稻的那几日，此后，一切都不同了。1993 年 10 月 24 日上午，张玉环把收割好的稻谷拖回家，铺在晒谷场上。下午，他听说同村两个小孩找不到了，其中一个是对面邻居家的。他跟着村里人一同找，直到晚上也没找到。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张玉环惦记着晒谷场的稻谷，新收的稻谷要晒两天。其他人都已把稻谷收进了屋，准备改天再晒，但张玉环等不及，因为第二天他要动身去上海。他在稻谷上盖了一层塑料膜，独自在晒谷场守着，怕被人偷。

谁也没想到两个小孩竟是死了。第二天中午，附近北岭林场医生张幼玲听说，小孩尸体在村西北面的下马塘水库里被发现，直觉有些不对劲：“我们跟下马塘水库隔了一座山，是丘陵，不高，但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能走过去，而且，我们张家没有田地在那个地方，小孩不会记得

路。”他顾不上午休，冒雨骑自行车去水库，被告知尸体已经转移到后山，又调转车头，在小道上飞奔，心里的疑惑更大了：枯水期的水库只剩下底部一层水，怎么会淹死人？

他赶到后山时，村民们正准备埋葬尸体，一群人围着打土坑。大家不敢看小孩尸体，用草席遮住放在一边。张幼玲走上前掀开，头皮一下就麻了：一个孩子面上有两道从嘴角向外延伸的勒痕，另一个孩子的脖颈两侧，分别有四个瘀痕和一个瘀痕，那是一只手掐过后留下的痕迹。他让家属赶紧去报警。很快，警方认定是他杀，并且是熟人作案。

张玉环去不了上海了，警察封锁了村子，挨家挨户录口供。他雨夜守谷的举动变得非常可疑，在后来的公安机关案卷里，雨夜守谷成了抛尸前的掩护，他被认为是一个胆大心狠的杀人犯。警方列举了几条怀疑张玉环的理由：村民反映，他在案发后一反孤独沉默的常态，情绪激动，变得活跃；他左手、背部有几条带血的伤痕；死者生前曾将他家炊房里的盐、酱油等物倒入水缸；现场打捞上一个麻袋，而张玉环家麻袋数量较多。



“凶手”

1993 年 10 月 27 日，张玉环被警方带走。一个星期之后，他先后做出了两份有罪供述，在作案地点、作案经过、作案工具、藏尸地点、抛尸过程和藏尸工具等方面互相矛盾。

后来在再审的法庭上，张玉环解释，两份有罪供述均在 24 小时不间断的刑讯逼供下做出，他当时处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他们放出狼狗咬我，咬在大腿上，裤子也被咬破了，满腿都是血……将我双手反铐在背后，用扫把撬手臂，同时对我拳打脚踢。我的肋骨被打断一根，要我按办案人员意思编造口供，不然就活活打死我。”

警方根据张玉环的口供，从他家取出一根镶嵌红头绳的麻绳，认定这些是勒死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工具，又将从水库里打捞上来的麻袋认定为运尸工具。警方鉴定得出结论：张玉环上衣提取物与打捞上来的麻袋都是黄麻纤维，同时，“张玉环左食指和右中指的掌指节背侧的伤痕手抓可形成。”除此之外，本案未做任何其他鉴定，包括对认定的关键物证麻绳、麻袋做 DNA 鉴定，以及对认定为抓伤张玉环的小孩的指甲做提取物鉴定。

家人以为张玉环只是去协助调查，很快会回来。不料，数日后警察到村里宣布：案件已经破了，张玉环是嫌疑人。当时，有罪推定的思维依然普遍，村里人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结果。村民后来告诉本刊记者：“即使有非议也不敢说。没看到是谁干的，谁也不敢出头。”

受害者家属把怒火发泄到宋小女和张玉环的母亲身上，横眉怒视，甚至出手打人，村长也把张玉环从家谱里除名。然而，家人一直无法相信他是杀人凶手。

1995 年 1 月 26 日，南昌市中院一审开庭，

左图：张玉环（中）和儿子与母亲在自己入狱前的住处前留影 图/胡晨欢
右图：被认定为案发现场的张民强的房间，如今屋子片瓦不存，家具已坍塌成木片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判决认定，张玉环用手卡、绳勒、棍打的方式，将两名男童杀害，并抛尸水库，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庭上，张家人第一次见到被带走后的张玉环，听到他说有罪供述是屈打成招，大哥张民强很愤怒，当庭骂道："不应该承认，即使打死了，也是死你一个，不会牵连家里人。"

张玉环当初因为担心连累家人才认了罪，没想到认罪仍连累家人，回到看守所后非常后悔，就把床单绑在窗户上上吊，幸被狱友救起。自杀不成，他决心为自己讨个公道。他在上诉材料中写道："想起自己的冤情，我曾经自杀过，要不是同号子的囚犯救了我，我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我希望政府认真尽快地把案情追查清楚，恢复我的自由。"不久，江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张民强回忆："当时心里好高兴，等待重审，一等就是八年。八年当中，走了南昌市政法委、南昌市中院、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每到一个部门，人家都知道这个事，但回复都是'等'！"张玉环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又自杀了一次，用牙刷捅自己的喉咙，再次被人救下。张民强理解弟弟的苦楚："他在看守所八年，人生这八年完完全全浪费了，判又不判，又不放人。"

2001 年 11 月 7 日，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南昌市中院重审判决再次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判决结果与原审相同。张家人大失所望。张民强说："弟弟在法庭上辩护的时候，邓小斌律师还在法庭上为我弟弟竖起了大拇指，认为弟弟辩护得非常好，我弟弟一定可以无罪释放。"张玉环再次上诉，但被驳回。同月 28 日，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定，张玉环被判死缓。

家信

张玉环在看守所的八年里，家人无法探视，他只能通过写信与外界交流。

1996 年 11 月，江西省高院作出发回重审决定 20 个月后，他给母亲张炳莲写信："我最后一次求妈妈，想叫您带着我的儿子去省政府叫喊我的冤情，在省政府呆（待）十来天，没有钱，讨饭都要坚持下去，也许会引来社会上的痛（同）情，有可能也会碰上个大清官，我只有这样做才能为我洗清明白。"



张玉环（左）跟自己的儿子学习用智能手机通话 图/胡晨欢

他知道家里难，但不知道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自从警方宣告他是杀人嫌疑犯，宋小女在村里住不下去，带着年仅 4 岁和 3 岁的两个儿子投奔娘家。她先去卖菜，却越卖越亏。"我总想着张玉环，又不会算数，经常多找钱给人家。"后来，她去深圳打工，把大儿子给张炳莲抚养，小儿子交给自己的父亲。1997 年，父亲去世，从此两个孩子都待在张炳莲身边。

之后，村里重新分责任田，张玉环和宋小女不在村里，田地被收走，还在读小学的儿子张保仁和张保刚分到了半人份的田地，张炳莲和小儿子分到两人份的田。全家共有六七亩水田，七八亩旱地，所有的农活都由张炳莲和两个孩子承担。

"我们七岁就跟着她（祖母）种田，种水稻、花生、西瓜、芝麻，西瓜熟了就把它搞掉，种花生。花生搞掉了就接着种玉米或者种油菜，有季节性的。"张保刚回忆，"种稻谷的时候，我们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扶着牛去耕田。"

张炳莲精打细算，舍不得用肥料和打虫药、除草剂，土地一年四季没空着，但收成不好。张保刚和哥哥一年只有年三十那天才能吃一次肉。"她种了好多，可是没肥料长不出来，人家的玉米杆手臂一样粗，她的玉米杆像手指一样细，我还以为玉米就该是这么小的。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也很奇怪，为什么人家都不用除草，我天天都要去拔草，三亩地要拔好久。"

2001 年 1 月 24 日，张玉环给母亲写信，商量和宋小女离婚。"我听说她在福建找了一位男朋友（我也不清楚是真，是假）？妈，这次过年小女回家对你还好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您，如果下次万一她要离婚，就要她离吧，我有一



项任务托付小女，就是保仁、保刚抚养问题。”

宋小女离婚是迫不得已。她到深圳后，因为不识字，没能当上服务员，在餐馆后厨做帮工，包饺子、洗碗、拖地……什么杂活都干，还牵挂着张玉环和两个孩子。劳累、失眠、愁闷，她还患上了子宫瘤。“我以前在张玉环身边，连感冒都没有得过，在深圳心里压着事，我也没发现，子宫瘤越来越痛，不得不开刀了。”她害怕，若是出什么意外，儿子没人照顾。

她最终同意和弟弟一直向她推荐的男人见面，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我家张玉环被冤枉关起来了，我随时要去看张玉环；第二，帮我照顾我儿子，不用对他们多好，比别人好一点就行；第三，我想去乡下看婆婆。”男人点头，宋小女改嫁了，两人一起去西安开了两元商品店。又过两年，宋小女接儿子们过去一起住。

儿子们太小，又去了外地，不能来看望张玉环，他隔几年便给儿子们写一封信。2004 年元旦，张玉环在信中嘱咐兄弟俩：“你们不要太顽皮了，在学习上努力追求上进，为将来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彼时，张保刚早已辍学，他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家里条件不怎么好，成绩也不怎么好，就没读了。”张保仁一直在家读完初中，没再继续上学。上学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村里小孩不和我玩，跟我说，‘你是杀人犯的儿子’，即使去旁边镇上读中学，同学还是会议论，你去读书，村里的小孩也会去，都会知道的。”张保仁回忆。

2005 年，兄弟俩从西安出发，去潮州打工，此后珠海、苏州、广州、福建，一路漂泊。张玉环无法及时掌握他们的行踪。2008 年 3 月，他鼓起勇气向儿子们敞开心扉：“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敢去面对你们……我也很想一家人能够快乐幸福地在一起，我也想能够自己照顾、抚养、教育着亲生骨肉，我也很想很想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可是，现实无法成全我，更无法改变这一切。”信寄到西安时，兄弟俩去了广东，那封信又被退回到张玉环手中。

申诉

被定罪之后，张玉环和家人从未停止申诉。

宋小女的方式是写上访信。因为身体原因，她只读过四年一年级（一直复读），不识字，信是用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写出来的，内容很简单：“你好，我是张玉环的妻子，我老公是被冤枉的，我大儿子（当年）4 岁，小儿子（当年）3 岁，你们要帮我洗刷冤屈。”寄信地址她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往北京送的，寄了五六封，全部石沉大海。

张玉环的大哥张民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重审判决后，他多次写信申诉到江西省高院立案处，但无人过问。好心人跟他说：“张玉环的案子在这里是没有用的，你要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看看是否有人帮你立案，一旦立了案就一定会翻案，像张玉环这样的案子如果真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三个张玉环也要立即执行死刑的，张玉环保住一条命是有原因的。”

当时，张玉环刚到南昌监狱服刑，被分去

做衣服。因为不服判决，他用剪刀把做的衣服全部剪掉，被管教罚禁闭。张民强知道后劝他，一边努力做事，争取减刑；一边继续申诉，“我们就写给最高院、最高检、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一个礼拜写一封信，四个地方都写一遍，一个月就过去了。”

有时候，张玉环把自己写的申诉材料交给张民强，大哥会帮他改掉错别字，改顺语句，再拿到打印店让店员输入电脑里，批量打印。张玉环在监狱里面一星期寄一封信，张民强在外面也一星期寄一封，一直寄到2017年。16年中，只在 2008 年 10 月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函，说已经转给江西高院，但一直没有下文。

张民强后来跟律师王飞和尚满庆说起这件事，才发现那封回函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再审程序，这只是一个信访程序，也才知道律师每次交给法院材料，都会拿到回单，而他们寄去的信没有回单。“走了好多弯路，也没有专业人士教我们，请律师要钱的，我们家没有钱。”张民强介绍，有好心人曾给他推荐了两名律师，但他家出不起钱，连差旅费也承担不起，最后不了了之。

2016 年，在张民强看不到再审希望的时候，江西乐平奸杀案再审，原告被改判无罪。这个案件像一个信号，让一些像张家这样的人意识到，江西司法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转折

张幼玲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景象：暑气蒸腾的夏季午后，他骑车穿过田地，汗流浃背，见张玉环的母亲顶着日头，一个人在田里干活。这让他心如刀割，自我安慰道，“我是出于正义感，他（张玉环）罪有应得，就应该是这样。”

可接下来的一件事，让他产生了动摇。2002 年，他的一个朋友持刀抢劫，和张玉环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他去看望朋友时，问张玉环情况怎么样。朋友说，张玉环在牢里绝食、闹腾，一直叫冤。2012 年，朋友出狱，去张幼玲家喝酒，跟他说，张玉环还是一直叫冤。

2016 年底，张幼玲看完乐平案的报道，想起张玉环，心里像堵着一块石头：“张玉环究竟是不是被冤枉的？我要把这个弄明白。”当年，他看出小孩的死不是意外，让人报警，张玉环之后被抓。而此时，他想为张玉环争得一个机会。

2016 年的 12 月，他找到江西记者曹映兰介绍此案。曹映兰认为值得报道。她后来回忆：“当时乐平案刚刚宣判无罪，给一些有同样遭遇、但一直申诉无果的人看到了希望。”2017 年 1 月 24 日，她来到张家村采访。稿件最后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发，但她相信，张玉环是受冤枉的，就把张玉环案介绍给自己在报道乐平案时认识的律师王飞和尚满庆，希望他们能免费代理。

王飞和尚满庆看完判决书，觉得难以置信：“这么简单的案件，这么不充分的证据，我甚至觉得都没有证据，就把人给判了。”终审裁定书上称：被告人张玉环从责任田抱禾草回家，进厨房喝水时，见本村小孩张某荣（男，六岁）、张某伟（男，四岁）在他家的屋檐下玩，将台阶上的土往阶下扒，联想到张某荣以前打过他儿子，倒掉过他家的油盐，心生怨恨。

“为了小孩调皮去杀人，这是一个成年人干的事情吗？他（张玉环）有两个孩子，跟被害的男孩年龄差不多，我觉得做父母的，推己及人，他不会有杀心，除非精神有病。所以，我直觉判断这个案子有问题，然后再看证据，所有所谓的物证都是，张玉环嘴里边说出来一个东西，公安就去找一个东西，但问题绳子和麻袋跟这两个小孩有什么关系？这是没有证据能证明的。”王飞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

案件的判决也处于相对特殊的时期，尚满庆分析：“那个时候其实是严打末期，刑事政策是‘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可以认定案件，它实际上是降低了刑事的证明标准。结合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可以去试一试。”

2017 年 3 月，王飞和尚满庆到南昌监狱与张玉环会面。尚满庆对张玉环的第一印象是木讷，“我个人感觉张玉环确实不像杀人犯，我们接触过真正的杀人犯，而他估计是跟人打架都

很少的家伙，杀人可不是在家里宰鱼那么容易的，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那天他很兴奋，像小孩一样。我们跟他会见的时候隔着玻璃，拿着电话交谈，他身体自然不自然地在向玻璃靠近，想要接近我们，他的管教干部就让他坐下说，他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拿到案卷后，王飞发现了更多疑点：“张玉环供述里称用手卡了其中一个孩子的脖子长达三四分钟，但尸检却显示，孩子颈前皮下及肌肉未见出血，这不符合法医学的基本常识；在警方认定的死亡时间 11 时 30 分后，还有多位小孩称在 12 点多看到被害人在后山上走路；缺乏 DNA 鉴定也使得判决书上认定的抓痕、麻绳、麻袋并不确定是否与案件相关，而且这些都无法再检测了。被害者尸体在当年被早早火化，这也是家属多年来怀疑张玉环是凶手的原因之一，火化并没有经过家属同意，有他人干预的嫌疑。”

2020 年 7 月下旬，《南方人物周刊》曾向当年办案警察咨询“张玉环案”细节疑点，对方回复：个人不能接受采访，要得到组织同意。本刊记者之后向进贤县公安局、进贤县政法委和南昌市公安局提交采访申请，但截至发稿时，尚未获得答复。

2018 年五一前后，王飞去了一趟张家村，走访判决书里提及的人，前往被认定为作案现场的张玉环家和抛尸现场下马塘水库。这次调查再一次佐证了他的想法。“一个不真实的杀人案通常伴随很多不合逻辑的情形。我找到当时协助警方办案的村长，他说警方让他把张玉环找过来的时候，张玉环正在吃饭，吃得很香，也很自然，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都杀了人，还吃得这么香？张玉环的屋子，门口就是村里的主干道，道路两边都是房子。说他杀人的那

母亲张炳莲在自己屋子里收拾出一间房，买好新的凉席和被褥，等待张玉环回家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个房间，就是靠路那侧的房间，窗户一点遮挡物都没有，连玻璃也没装，这太不真实了。”

其后王飞把这一次调查的笔录提交给法院，2018 年 6 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立案复查，2019 年 3 月份决定再审，2020 年开过两次庭前会议后，于 7 月 9 日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王飞、尚满庆为张玉环进行无罪辩护。庭审中，检察院建议改判张无罪。8 月 4 日，江西省高院宣判张玉环无罪。在羁押了 9778 天后，张玉环重获自由。

张玉环得到平反，但王飞和尚满庆不认同法院认定的“疑罪从无”：“张玉环根本称不上疑罪从无，都没有直接的证据，没有正当性的理由去怀疑他，如果仅凭一个人表情不自然，以前和他人有口舌之争，就把人抓进去，刑讯逼供让他招认，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杀人嫌疑犯，对吧？”

回家

2019 年 3 月，看到再审裁定书以后，张玉环相信自己一定会平反。“全家人、这么多律师都在帮我，我不担心。”

2020 年 7 月，张玉环案重审，宋小女提前带着两个儿子从福建赶回。7 月 9 日，她穿上新衣服，花了两个小时梳头，戴上儿媳买给她的蝴蝶形镶水钻发夹，等待张玉环回家。“等张玉环回来，我就变成长不大的孩子了。”宋小女笑道，但很快，她意识到这样溢于言表的情绪不大合适，就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补充说：“我还要跟我老公一起生活，他对我特别好，赚钱做家务，不要我做任何事。”不过，当天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8 月 4 日宣判前，张民强被进贤县政法委叫去商谈张玉环释放的事项。张民强希望弟弟能“堂堂正正地从法院大门走出来”，“当时他们同意了。”但法院宣判张玉环无罪时，后者并没有现身。当日 19 时左右，他被直接送回张家村。审判长称：“出于疫情的原因，决定不让张玉环出庭，直接从监狱释放。”

张玉环回到家中，看到房子已经多年没人住，瓦片碎在地上，植被从屋里裸露的泥土中破土而出。当年结婚时，他亲手打的高低床、五斗柜和衣柜也都腐烂成木片，难以看出原来的模样。张炳莲在自己的屋里，收拾出一间房，铺上新买的凉席和被褥，旁边放着宋小女新买的牙刷和毛巾。

他被亲人和媒体包围，显得有些局促，双手乱摆：“村子里的人，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大了，连我的母亲和儿子也认不出，母亲和大哥头发都白了。我的儿子，当年只有三四岁，现在这么大了，我的孙子都有 11、12 岁了，还从没见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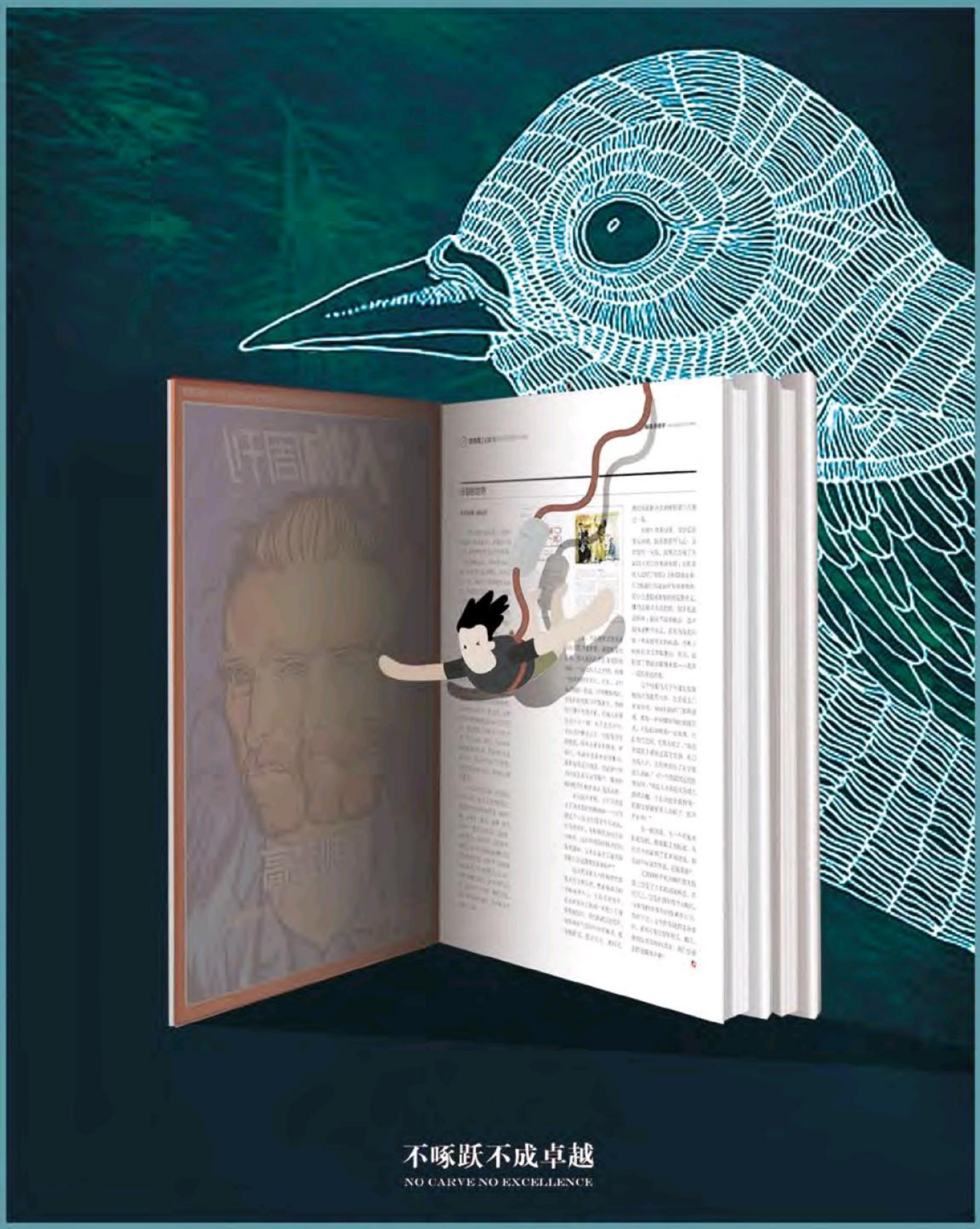
张玉环过去在监狱里，只能看着家人的照片，在探视的时候听人说：“你有孙子了，你有两个孙子了，你有三个孙子了，你有四个孙子了。你一出来就子孙满堂。”

“宋小女改嫁，我不恨她，她也是生活所逼。儿子刚才见面时怪我，心里恨我，我也能理解，我没有做好父亲，也没做好儿子。”他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两间拆迁房，让他和儿子有住处，再分几亩田地，让他孝敬老娘。张保仁和张保刚的户口在这里，他们孩子的户口也在这里，未来，他们可能会结束在福建的漂泊生活，回到故乡，和张玉环一起生活。但宋小女在张玉环适应环境后，就会回到重组的家庭。

“我两个月前刚查出糖尿病，眼睛也不行了，很大的字也认不清，要戴老花眼镜。最可怕的是我和社会脱节了，我连空调都不会开，昨天是我第一次摸到空调遥控器、手机，我儿子给我买了一个，也还不会用，他让我慢慢学。”张玉环说。

8 月 8 日，张玉环一家九口离开张家村，搬到了在进贤县城新租的一套三居室，月租 1000 元。张玉环向媒体透露，希望先在家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申请国家赔偿。他也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刑讯逼供”人员的刑事责任。

张玉环无罪释放后，他的侄子写道：“‘张玉环案’无法一白遮百丑，更不能做到以风光的冲喜，去抹平整个家庭长达 27 年的冤屈和命运的改变。”



不阅读不知阅读的乐趣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己任，旨在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报道人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创刊十余年，已成长为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家庭读物的首选期刊。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南周订阅　邮政订阅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保卫一座堤

“保卫一座堤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寸都不能垮。”江国保说。查险抢险这件事在技术上并不复杂，堵“泡泉”的经验代代相传，湖区人人都懂

本刊记者 **杨楠** 发自江西永修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永修水保

1980 年，江国保考上了南昌的大学。同村人可以证实，这个消息震惊了全村。看上去，少年江国保日常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修水里摸鱼，或者舀干小池塘里的水捞鱼。最多见的是鲫鱼和黄辣丁，运气好能摸到桂鱼。桂鱼多刺，一摸到就扎手。

江国保家住永修县三角乡。永修依修水（又称修河）得名：泮临修水，永受其利。江家离修河五百米。“不，是三百米，”江国保纠正了下，涨水时三百米，枯水期五百米。

他去南昌学了水利，专业是高中老师填的。学什么都行，只要不当农民就好。每年夏天是乡下的“双抢”时节，抢收和抢种。四十年后，江国保描述暑假下田双抢挣工分的日子，依旧面露难色：“很累，很难受，就不想做农民，想吃商品粮。”

1983 年发大水，三角乡溃坝，小河淹成了大湖，江国保从永修车站划船回家。他家在高高的堤坝上，没被淹到。江水冲决了堤身，尚未漫过堤面。整个夏天，江国保手脚起满了水泡，“洪水是脏的，浸泡了太多东西。那年没有稻子，捞鱼虾吃，身体内火气重。”

次年，江国保毕业回乡，成了永修县的水利技术人员。从此，人们称他“江水保”，他是

三角乡,泡在水中的楼房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永修县屈指可数的几个水利高级工程师，从农田水利到防洪抗旱，周周都在田地和堤坝打转。

2020 年夏天，站在永修县的九合联圩上，有人对江国保打趣道：“你都堵了 36 年‘泡泉’，还不厌啊？”

江国保咧嘴笑起来，说：“他们先让我把三角乡搞倒了，再让我来九合捣乱。”

抢险

对江国保来说，2020 年大水和 1998 年一样，他先在三角联圩抢险，然后三角联圩溃坝，他又去了九合联圩。

“保卫一座堤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寸都不能垮，”江国保说。

查险抢险这件事在技术上并不复杂，堵“泡泉”的经验代代相传，湖区人人都懂。粗糙地说，堤坝上的险情分为两种：管涌和漏洞。“泡泉”是管涌的表现形式：在堤脚附近出现水流漩涡或是翻出浪花。在渗流作用下，水流加速通过堤身的泥土，寻找空隙冒出。如果不及时处理，水流带走的土石越来越多，孔道扩大，基土被淘空，堤坝可能突然决口。而漏洞，则是一眼可见的背水坡陷落一大块，形成漏水通道，水流从背水坡溢出。

鄱阳湖地区地质组成为二元结构，一般包括黏土层和卵石层。卵石层透水性强，水位高则水压大，水流在卵石层不断加速，容易冲破黏土层带出堤坝的基土。永修人常说，他们不需要打地下水，表层水就够多。

无论出现管涌和还是漏洞，处理险情的基本思路都是用土石压住出水点。这些土石的主要作用是过滤，留有空隙让水流溢出——水因势赋形，不从这个口出来就找下一个出口——但阻挡堤身土的细颗粒被带出，因而堤身结构不被水流破坏。

查险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多位在堤上的江西省水利厅派驻的专家说，查险别无他法，唯有靠人一寸一寸巡查。

按照要求，堤坝平均每公里就要设置一个巡查点，每小时巡查一次。巡查人员两人一组，穿胶鞋持木棒，拨开杂草看一看有没有“泡泉”，用脚踩一踩试试有没有被浸泡塌陷的泥土。九合联圩和三角联圩都属于必须死守的重点圩堤，堤内都有超过五万亩良田。

7 月中下旬，在九合联圩上，我问九合乡门楼村村长，你担心会溃坝么？此前几天，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突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九合乡对面的三角联圩因为一个未有及时报告的西瓜大小的漏洞，而遭遇溃坝。门楼村负责巡插的木头塘已是彩旗飘飘——每发现一个险情要插一个彩旗的标记，木头塘在一周内发现了近百个大小险情。

“不担心。”村长说，“98 年那么差的土堤都没有倒，今年怎么会倒。”村长背着手站在九合联圩上，他眼前是一片翠绿的农田。“双抢”时节即将到来。

水灾

湖区人有一种“见多识广”的气量。洪水淹没了自家的房屋，三角乡人说又不是没见过，“83 年、98 年不都淹过。”

“洪灾旱灾年年有，只是大和小，”江国保说。在 1986 年修订的《永修县志》里，记载水灾的篇幅超过了旱灾、虫灾和风灾的总和。其中不乏这样的描述：“六月大浸，漂没县门屏墙十余日，居民架木以渡，庐舍、场谷，一皆漂散。”“修、潦两河沿岸白浪滔滔，一片汪洋。”

三角乡副乡长熊斌不是湖区人，但在三角乡工作的近三十年里，他觉得自己算是见过世面了。1998 年大水，三角乡一度保卫住了堤坝。不想遇到“二度梅”，8 月第二个雨期来临，南面的外堤决口。

“那年好难过的。”熊斌说，他走在堤上都不敢抬头，觉得自己对不起百姓。他那时年轻，心里绝望地想，完了完了，乡政府要散伙了，三角乡要从地图上消失了。

过了几天，水位渐高，内堤压力增大，有

漫决的可能。防洪指挥部决定挖开西北面的一段圩堤，引洪入乡，减小堤坝两边的水位差。熊斌被派去引洪口，劝阻村民。“我说领导你这是让我去死啊，你让我站在洪水进来的地方。领导说不要紧的，一天一夜都涨不满的。那一年，我知道了水要流一天一夜也不会满，所以我今年不慌。”

熊斌所不慌的是，即使出现溃坝，三角乡的居民应该都能被安全转移，不会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做了预案，在村子里敲锣打鼓还有放喇叭，喊大家转移。村干部，派出所，还有救援队都会帮助转移群众。”

2020 年 7 月 12 日晚，三角联圩发生决口。江国保已经在堤上查险抢险了一周多，但从未接到过决口处的险情报告。决口处属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责任段，但最受影响的是三角乡。

江国保接到溃坝电话时还抱有不确定的希望，直到自己亲眼看到江水从决口处涌入三角乡。一同防洪的人说，我们每天没日没夜地工作，白天查险晚上修路——运沙车把堤面压得凹凸不平——最后水还是进来了，你说我们难过么？

江国保倒不是为自己难过，他知道今年三角乡要绝收了。他所负责的三角乡农田水利工作，去年刚刚建设完成国家高标准农田。

“灭顶之灾”，熊斌这样形容。1998 年之后，三角联圩完成了两次除险加固工程，将堤面上的住户全部迁离堤坝，在堤坝五十米外重新安置。堤身属地势高处，迁离堤坝意味着以前大水可能淹不到的房屋，今年全都浸入洪水。

“每年都说雨情是中水偏大，小雨当大雨对待。这话听多了，没想到今年会决口。”江国保说。

水利专家

江国保问我，专家组是不是说他不听话。我忙澄清：“没有没有，万所夸赞你许多。”

万怡国是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农水所所长，2020 年 7 月 12 日作为专家组组长被江西省水利厅派至九合乡进行查险抢险。往年他也要上堤防洪，不过是他一个人负责九江下属所有县镇；今年则是三个专家管一座圩堤。

万怡国第一次从九合联圩查险下来，就听闻了三角溃坝的消息。“真的不可能会倒圩，”几乎每个三角乡人都这样觉得。这个不可能的消息促使万怡国当晚又重新上堤，查了一个通宵。

万怡国处理的第一个险情是“跌窝”（漏洞的一种表现，堤身发生局部塌陷）。紧接着专家组又查出了二十个左右的险情，眼睛看到的泡泉或是用脚踩出来的塌陷。

专家组到来不仅是为了指导抢险工作，也有“钦差大臣”下来监督工作的意思。三角溃坝之后，永修县防洪工作到岗到位的情况好转不少。





左上图：九合乡木头塘，水利专家万怡国在监护管涌险情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左下图：三角乡排涝，第一根水管抽水成功 图/本刊记者 杨楠
右图：九合乡木头塘村民巡堤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险情点，最常听到的问话是，“是清水吗？”所有人都期待清水，有时会互相找补：“这不是底下带出的泥沙，是面上带出的泥沙。”评估险情处理结果的重要标志是“清水”。出水点流出的是清水，就意味着对堤坝不会造成破坏。

堤上防洪人员有时会感到困惑，说省里的专家说的处理方法和市里的专家不一样，市里的又和县里的不一样。虽然处理险情的基本思路一致，都是压住出水点，任水流而不带走基土。但在具体的处置方案上，江国保讲求的是最快最有效，能用卵石都压住，就不要分多种材料去处理，稍微带出一点泥沙也没问题。万怡国注重细节，尽量将所有可能都考虑到，一次处理到位。万怡国惯用卵石、粗砂、细沙分层压住出水点，层层过滤，确保冒出的都是清水。多数时候，万怡国会自己动手去铺平细沙。

有一个细节，江国保和万怡国是完全一致的。大水过后太阳毒辣，上堤时间太久，他们皮肤都晒到脱皮，呈现出斑驳不一的炭色。

家乡

整个 7 月，永修县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本职工作停摆了大半，人人都上堤抗洪抢险。还有些不临水、在山上的乡镇，也派了村民来支援堤坝。

无论是九合乡还是三角乡，防洪的一大难点都在于人手不足。一方面是本地青壮年多外出务工，人口流失严重，上堤防洪的多为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另一方面，即使是留在村里的青壮年，也并没有全部上堤防洪。九合乡的一位乡长说，自己很多年没见过自发保卫家园的场景了，他认为巡堤工作不应支付村民报酬，“是保卫自己家啊，”他说。

“经济上去了，思想教育没跟上，现在都一切向钱看。就算上堤，也是磨洋工。”熊斌叹了口气说，“有的人在外面买房了，也不把这里当家了。”

7 月 22 日，三角乡人江国保又被叫回了三角乡。路途中，两乡乡长和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来回与他通电话，九合乡希望他留下，三角乡希望他快点回来。

三角乡要开始排涝了。溃口已经堵上，三角乡被淹成了一个池塘，水流无处可去，只有借力水泵，抽入数十根钢筋管道，流回修河。

江国保要做的事情很多。他要告诉施工队管道需要接多长，抽水口需要伸多远，还要给乡里出主意，如何降低排水口的水流对堤坝的冲击力。引水坡的堤脚没在修水中，排水口下方的水面上被放置了一块木板，减缓水流对堤脚的冲击。

一位三角乡的村民听说我要上堤看排涝，主动说用摩托载我去。在堤面颠簸的路途中，他说昨晚自己搭着一个汽车轮胎游回了家，守了一夜。“我们隔壁家的电视都被偷了，我也怕，就回家守着。”

他让我拍几张抽水管下水的照片给他看看，这毕竟是个好消息。“希望能早日回归家园，”他说。

第一根抽水管在一个傍晚下水，那天夕阳都带着喜悦的颜色，粉中透出橙光。堤上的人都忙着拍照，熊斌对我说：“你看我们三角乡多美啊。”





INTERNATIONAL 国际

前国王因丑闻流亡，西班牙王室会垮掉吗？

特约撰稿 赵灵敏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当地时间 8 月 3 日，西班牙王室公布了 82 岁的前国王胡安·卡洛斯写给儿子、现任国王费利佩六世的诀别信，信中宣布了他离开西班牙的消息，声称由于眼下关于其“私人生活中的某些往事”在公众间不断发酵，“为了更好地服务西班牙、整个王室和作为国王的你，我现在通知你，我已决定离开西班牙开始流亡。”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费利佩六世则表示了“尊重和赞赏”。

胡安·卡洛斯国王是西班牙“神圣的民主象征”，曾击败塞万提斯，被选为“最伟大的西班牙人”，如今却堕落为贪污嫌疑犯，流亡海外

卡洛斯的去国，主要原因是他涉嫌收取沙特方面的巨额回扣，作为他促成西班牙财团承揽沙特高铁项目的回报。此事在 2018 年被揭发出来，目前卡洛斯面临着洗钱、逃税、财产来历不明等多项指控，西班牙人群情激愤，多地爆发了要求废除王室的游行示威，网上也发起了要求更改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名字的请愿书。

事实上，卡洛斯自 2012 年就陆续被

曝出了丑闻，不得不在 2014 年被迫退位，只是之前的丑闻基本上停留在道德层面，而这次已经演变成了刑事案件。由于退位的国王已经失去了司法豁免权，不排除卡洛斯未来会被判有罪。

眼见着老国王已成负资产，西班牙王室开始了与他切割的过程：2020 年 3 月，停止发放给卡洛斯每年 19.4 万欧元的王室津贴，费利佩六世也宣布放弃对父亲个人财产的继承权。最近几个月，费利佩六世的两个女儿也经常亮相，王室显然是希望用两位公主清纯无邪的脸庞来中和老国王丑闻事件的影响，拯救王室形象。卡洛斯选择自我流放，同样也是一种断尾求生，避免自己的不当行为影响到王室存亡。

目前，关于卡洛斯在何处存身，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加勒比岛国多米尼加的富商朋友处，另一种是住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里。而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他根本不在乎西班牙民众的感受，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完全没有从过去的丑闻中吸取教训，这样的消息传回国内，只会增加西班牙舆论对他的恶感。

近年来，由于受到失业率高企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主义等问题的影响，西班牙政局不稳，党派纷争激烈。新冠病毒冲击之下，西班牙又成了染病人数最多的西欧国家。在这个人心浮动的节骨眼上，一个一意孤行、执意放飞自我的前国王，对西班牙君主制的存亡肯定不是好事情。可以说，西班牙的君主制，成也卡洛斯，败也卡洛斯。

近代少见的王室复辟

西班牙王室的血统起源于 5 世纪的西哥特王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室之一，论历史的久远只比“万世一系”的日本王室稍稍逊色。

公元 1492 年，西班牙境内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国合并，形成统一的西班牙王国，费尔南多五世与妻子伊莎贝拉一世共治西班牙，他们两人正是哥伦布航海计划的赞助人。此后，西班牙先后经历了特拉斯塔马拉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波拿巴王朝、萨伏伊王朝的统治，前国王卡洛斯和现任国王费利佩六世都属于波旁王朝。

当年，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君主查理二世没有子嗣，于是立下遗嘱，确认法国王储的次子安茹公爵为其继承人。1701 年，安茹公爵即菲力浦五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法国波旁王朝正式入主西班牙。此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为夺回在西班牙的王位发动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双方在欧洲大陆厮杀征伐达 12 年之久，欧洲列强均被牵涉其中。1713 年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确认菲力浦五世为西班牙的合法国王，法国波旁王朝就此在西班牙扎下了根。

19 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废黜了国王费尔南多七世，拿破仑任命其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新国王。西班牙人奋起反抗法军的入侵，1812 年，西班牙各路代表齐聚加的斯，通过了新宪法，确定了王权和教会权力的界限。战后复位的费尔南多七世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第一位君主立宪制的国王。

但是，西班牙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不稳固，此后的一百多年，君主专制多次复辟，西班牙内乱频仍，命运跌宕。1873 年，西班牙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史称西班牙第一共和国，但一年多后就被君主专制颠覆。1931 年，西班牙再次爆发反对君主制的革命，波旁王朝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迫退位，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

但第二共和国同样动荡不安，左右翼争执不下，先后成立了至少 28 个政府。到了 1936 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左翼势力最终被镇压，军官佛朗哥在 1939 年建立了独裁统治。

佛朗哥虽然独裁，但从没打算自己当国王，由于他本人只有一个女儿，在权衡利弊之后，于 1948 年 11 月将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接回国内接受教育，并于 1969 年指定他为继承人。佛朗哥给了胡安·卡洛斯最好的教育，但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并



8月10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带着王后和两位公主在马略卡岛的佩特拉走访参观

告诉他："殿下，你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不同。"可以说，卡洛斯民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也知道其结果是什么。显然，他意识到民主化是大势所趋，而有意对继承人进行栽培，将民主化的事业留给他去做。

1975 年 11 月 20 日，铁腕统治西班牙达 39 年之久的佛朗哥去世。22 日，胡安·卡洛斯被立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王室奇迹般地再次复辟了。但卡洛斯并没有继续佛朗哥的衣钵维持独裁政权，而是还权于民，主动打破独裁，支持民主政府，只保留了国王的象征性权力，让西班牙成功过渡到了君主立宪制，此举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赏。

1981 年，一批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国会大厦，想借国王之名恢复军政府独裁。但卡洛斯拒绝了这种诱惑，逐个给高级军官打电话表明反对的态度，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呼吁民众支持民主，政变在 18 个小时后就结束了。危急时刻的力挽狂澜，使得胡安·卡洛斯成了西班牙恢复民主的符号，进一步推高了他的声望。

在 2007 年 5 月举行的一次投票中，胡安·卡洛斯被选为"最伟大的西班牙人"，落败者包括哥伦布和塞万提斯，他在西班牙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君主制日益没落的当下，

正是卡洛斯本人赋予了西班牙君主制以合法性，让王室得以复辟并被西班牙人接受下来。

丑闻中的自保

然而，5 年之后爆发的一系列丑闻，让卡洛斯国王的形象急转直下，从神圣的民主象征渐渐堕落为贪污嫌疑犯。

2012 年，74 岁的卡洛斯国王在非洲博茨瓦纳不小心摔了一跤，右髋部受了伤。西班牙政府派专机把国王接回国做手术。这时候，西班牙民众才知道国王是偷偷跑到非洲猎象摔伤的。当时西班牙正深陷债务危机，失业率接近 26%，全国上下施行紧缩政策，声称对此“夜不能寐”的国王却花了近 3 万英镑去打猎，这让西班牙国民非常不满。

而在媒体深挖“狩猎门”的过程中，又意外曝光了“情妇门”：原来和国王一起去打猎的并不是索菲亚王后，而是他的情妇——46 岁的德国金发女郎科琳娜·维特根斯坦。而且据称，加上一夜情在内，卡洛斯至少有过 1500 个情人，王后索菲亚老早对他死心了。索菲亚是希腊的公主，父亲和弟弟都是希腊国王，1962 年和卡洛斯结婚时，希腊王室还没有被废，索菲亚的地位高于前途不明、还没有被佛朗哥确立为接班人的卡洛斯。当年，两个人应该是真心相爱，索菲亚在婚后也深受西班牙人的爱戴，但两人的关系早已因为卡洛斯的出轨而面目全非，西班牙知名传记作家兼记者 Jaime Peñafiel 在其著作中披露：“王后经常遭到背叛，国王和她几乎从不睡在同一张床上。”

此后不久，一名西班牙男服务员和一名比利时家庭主妇相继宣称，他们是卡洛斯国王的私生子和私生女，两人分别向西班牙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通过验 DNA 来认祖归宗。虽然诉讼要求被驳回，但国王的好形象就此彻底崩塌。

雪上加霜的是，卡洛斯的二女儿克里斯蒂娜公主和丈夫乌丹加林也在 2014 年曝出了丑闻。夫妻二人通过慈善基金会，在 2004 到 2006 年间，利用暗箱操作，多次拿下西班牙一些地方文娱项目的承包权，榨取公共款项超过 620 万欧元，并利用这些非法所得过着奢侈的生活。最终，虽然克里斯蒂娜公主脱罪，但乌丹加林在 2017 年获刑 6 年。

接二连三的丑闻，严重打击了王室的声望。2014 年 1 月的民调显示，西班牙人支持君主制的比例已史无前例地跌破 50%，这绝对是一个不祥之兆。2014 年 6 月 18 日，在重重压力之下，卡洛斯正式宣告退位，由儿子费利佩六世继位。

2018 年，老国王的情妇科琳娜在一段后来被曝光的录音里声称，卡洛斯国王因帮助一笔赢得 55 亿英镑的沙特铁路交易而获得秘密佣金，这笔钱存进了瑞士银行。西班牙和瑞士的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帮助国王做账的会计师，目前，他已经转做“污点证人”，几乎可以坐实国王的黑金丑闻。2019 年 3 月，瑞士媒体还曝出，已故沙特国王阿卜杜拉 2008 年曾向卡洛斯的瑞士账户转了 1 亿美元，而卡洛斯指定的受益人是费利佩国王，这引发外界揣测费利佩国王是否也违法受贿。

费利佩是卡洛斯和索菲亚 3 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他本人高大阳光，曾经是奥运会帆船选手，自小接受治国训练，待人和善，没有骄横之气，2005 年和西班牙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播莱蒂齐亚结婚。莱蒂齐亚出身平民，此前离过一次婚，费利佩和莱蒂齐亚的结合，迎合了战后王室平民化的潮流，加上她容貌秀丽，衣着得体，言行举止从不出错，因此被认为是天作之合。目前，两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莱昂诺尔将是未来的西班牙女王。

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费利佩对父亲的行径应该是毫不知情。只要他们一家能从丑闻中择清楚，靠着此前长期经营的正面形象，应该可以对冲丑闻的影响，保王室无虞。况且，在目前动荡的政局之下，西班牙政府也需要王室发挥粘合剂的作用。西班牙人在经济不景气的苦况里，同样需要通过莱蒂齐亚王妃在国际场合的“艳压”来获得心理安慰。而能提供这些价值，正是君主制在欧洲得以残喘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42 东高村镇，一名工人在修剪提琴文化体验馆外很久没打理的花枝。前来参观的顾客可以在乐器厂的体验馆里看到成品高端小提琴和手工制作流程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后疫情时期的“提琴村”

图、文 **秦斌**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东高村镇素称“提琴之乡”，镇子路口是中国乐谷展示中心的大楼

东高村镇位于北京平谷区，距离市区约 70 公里，有着 30 年的提琴制造历史，素称“提琴之乡”。早在十年前，全镇的提琴产量已达 20 万把，产品远销海外，占世界提琴总产量的近三成。

在东高村镇，成立于 1988 年的北京平谷华东乐器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小提琴生产企业，产品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斯、二胡等。著名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吕思清、谢楠和美国国宝级小提琴家艾玛尔·奥利维拉，都拥有平谷出产的提琴作为演奏备琴。负责人刘云东介绍说：“以前全世界每三把小提琴，就有一把出自北京平谷东高村镇。每把琴只有一二百元，八成为低端产品。如今，向精品琴制作发展后，一把平谷提琴最高可卖到七八万元，质量的提升自然得到高端人士的眷顾。”

为了推动乐器产业转型升级，东高村镇借助提琴制造资源优势，打造了中国乐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降量提质，逐步淘汰低端初级琴制作，向中高端转型。如今，小提琴年产量由原来的 20 万把压缩至 12 万把，产值却从 5000 万元提升到 8000 万元。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制作系的刘尊飞，是乐器厂一名 90 后制琴师。13 岁时，挂在墙上的整排的小提琴制作工具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他与提琴制作结缘，硕士毕业后走上了专业提琴制作的道路。在他看来，小提琴的制作堪比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质，而不是量。小提琴的制作工序从拼板、刮板、刻头、装头到油漆等，往往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才能产生一把品质优良的提琴。

疫情之前，小提琴供不应求，80% 的产品远销海外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本以为今年会有个不错的销量，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销售一下停滞了。

国际市场受疫情影响巨大，“提琴村”开始瞄准国内市场，“现在中小学小提琴演奏越来越多，市场前景也非常广阔。”为了开辟销售渠道，刘尊飞加入了直播带货的行列，通过网络向消费者展示小提琴从选料到成品的工艺流程，介绍提琴文化。从线下转型线上，销售也慢慢地有所回暖。

乐器厂负责人刘云东感叹道，疫情的出现，让他对经营提琴产业有了更多的思考，下一步会加大提琴文化和在线教育培训的投入，完善提琴产业的结构。疫情的出现给“提琴村”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但同时也给产业提升带来了机遇。



8月4日，工人在搬运打包好的提琴。疫情让乐器厂的出货量大大减少



平谷华东乐器厂，由于订单减少、天气炎热，制作提琴的工人们轮流休假



1



2



3



4



1.工作人员将大提琴面板和箱体进行合琴操作
2. 工作人员为倍大提琴粘接低音梁
3. 一名小男孩在车间里看已经上完漆的小提琴
4. 乐器厂的制琴师在接待两名前来挑琴的顾客



一名小男孩在乐器厂的展览厅里学习拉琴



在全球疫情之下，提琴销售受到严重影响，制琴师刘尊飞（左）和同事一起开展直播业务



东高村镇音乐器材城，没有顾客的乐器大厅只留下两名工作人员坚守



东高村镇一环岛路口矗立的提琴雕塑

CULTURE 文化



马来巫师张贵兴

“伟人、纪念碑有人写，但我更想描写枯骨与地狱阴暗。
世界模糊，有人提着灯笼，希望能够照亮里面看不清楚的、非常黑暗的一部分，
这个人就是写小说的家伙”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余子奕**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张贵兴

祖籍广东龙川，1956年生于马来西亚砂劳越，1976年中学毕业后赴台升学，英语系毕业后留在台湾担任中学英文老师。作品多以故乡婆罗洲雨林为背景，处理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爱恨情仇。文字风格强烈，以浓艳华丽的诗性修辞，镂刻雨林的凶猛、暴烈与精彩。代表作有《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赛莲之歌》《顽皮家族》《野猪渡河》等。《猴杯》近日在内地出版。

晚上，卡夫卡的写作总要持续很久。创作于 1912 年的短篇小说《审判》，便是他一口气从晚上 10 点到次日清晨 6 点写出来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写作；只有以这种连贯性，才能够完全打开身心。”工人意外保险机构的工作使卡夫卡没法在白天写作。他会在早上 8 点带着一身困倦去上班。尽管很早就干完工作，剩下的时间却被午饭、长午觉、锻炼、散步和晚饭填满。一直到晚上 10 点。

同样的困境落在马来西亚作家张贵兴身上。可喜的是，他今年已 64 岁，理论上应该比卡夫卡拥有更多的时间；窘迫的是，他过去四十多年都在台湾教书，忙着和即将上高中的学生们一起受制于考试和升学压力。偶尔没课，就跑到学校附近每个座位都有插座的咖啡厅，招呼也不敢和老板打，生怕熟了之后会找他聊天，占据本就少得可怜的写作时间。有时实在着急，只能见缝插针地在办公室甚至直接在教室边看早自习边伏于讲台前动笔。

因此，实际上，他的写作时间非常少，以至于 1998 至 2001 年，他紧迫地完成了“雨林”三部曲后，整整停搁 17 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直到 2016 年 7 月，他提前一年退休，此后花了一年多，写出《野猪渡河》。

这本书自 2018 年年底面世，至今所向披靡，斩获了包括博客来（台湾最大网络书店）年度选书、台湾文学金典奖、联合报文学大奖、红楼梦奖等十多个奖项。在台湾，文学类书籍一般一次印刷两千本，能卖完一刷便算不错，联经出版社的编辑黄荣庆自豪地说，“《野猪渡河》目前是六刷了，算是我做过的书里最畅销且得奖最多的。”

聚光灯下的男主角本人，倒是对此看得很淡。他不喜欢谈论旧作（无论出版多久），每当看到 Facebook 上有人把多年前的剪报贴出来，他都十分不解，想起自己十几岁时在马来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背着吉他去雨林看书、弹唱等风花雪月的小说，恨不得立刻掏出遗嘱，写上“不可以出版我在马来西亚的少作”，“否则我会变成鬼来找你们”！

他一方面仍为过去迫于生活的选择而耿耿于怀，苦笑着说在台湾当职业作家大概会饿死，“不要忘记台湾只有 2300 万的人口，其中有一大部分人是不太读书的，除非你写一些非常通俗的言情、武侠小说”；其后又认命似的陷入难以修改的无奈，“没办法，你总要生活，那我只能够继续教书。但它占据了我大部分脑力最清楚、最强壮的时间，其实伤害很大。”

另一方面，他越发感到“时日无多”，终于自由的日子，只想埋首于预计 2020 年年底写完的科幻小说，以及一部将要提笔的、以台湾为背景的长篇创作，因此不愿为其他的事情浪费心思。演讲邀约尽量推辞，杂志拍摄或非去不可的颁奖典礼，一律随意套上圆领 T 恤出席；编辑把设计好的书籍封面拿给他过目，每次都会收到“都可以，你们决定就好”的回复。

《野猪渡河》以二战时期日军侵略为背景，讲述战乱年代的流离和求生，其中不乏屠杀、肢解、强暴、斩首的情节，虽不是抗战小说，但也同样血腥残酷。写完后，张贵兴一度觉得自己像满手血腥的刽子手，从暗无天日里走出



来，重回人间。据此，很难联想到写下这些的作者在生活中这般随和，如果不是他主动坦露，在哈姆雷特、贾宝玉、方鸿渐等文学人物身上感到共鸣的优柔寡断更难捕捉。

“贾宝玉对待女人的那种态度，很深刻地影响到我。对女孩子非常地欣赏，非常（心）软，就好像对学生一样非常（心）软。”一天下午他在家里的躺椅上看《红楼梦》，看到一半睡着了，梦见自己变成了贾宝玉。大观园里面看不到一个人，只听见外面传来丝竹声、女孩子嬉笑玩乐的声音，心想，诶？黛玉、宝钗，你们到底去哪里？怎么你们自己在玩，不来找我？最后在焦虑的踱步中醒了过来。回忆完，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用常年累日两杯咖啡入喉形成的嘶哑声音惊呼，“天啊，已经四十多年了，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从他讲述的另一个故事中，可以更明显感知到这份细腻与柔情。1940 年代，马来当地许多妙龄女子到处相亲、急着出嫁，以免因未婚被日军抢去做慰安妇。张贵兴的父亲一次与一名温婉美好得如同从琼瑶小说走出的长发女子在茶馆相亲，彼此都十分满意。快结束时，七八月里突然一阵猛烈的西南风刮过，女子露出半边脸大的胎疤，一段姻缘从此中断。

不善言谈的父亲，唯独将这件事向子女说过很多次，带着些悔恨与不舍地喃喃，“后来她怎么样了呢？”张贵兴也不禁浮想，并将她化作女主角写进了《野猪渡河》里。他体察到生命的巧合与微弱，带着南洋的意象，“如果没有日本人，没有那股灼热的西南风，可能也不会有我。”

创作中，他自认不走通俗路线，不会是讨喜的作者，“读者能不能进入我的世界，这个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于是将多愁善感的一面隐藏起来，只让读者感受到认真严谨就好了。“我写的时候，如果我觉得这种写法太通俗，不是很好的表达方式，我就不去用它。因为写长篇小说很容易不小心就灌水，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就写进去了，所以我尽量提醒自己，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写成一个句子，我就不要写两到三个句子，如果要写两到三个句子，描写得冗长，那一定是有特别的、值得我去书写的地方。”

婆罗洲的热带雨林





迟来二十年的错愕

在海峡的另一端，对他的关注来得更加缓慢，代表作《猴杯》时隔 20 年才于近日在内地出版，无论是热带雨林的文学地理，还是华丽奇诡的美学风格与鲜为人道的拓荒秘史，都令绝大多数大陆读者错愕不已。那种炽烈浓稠、潮湿多汁，恨不得要从纸张里滴出来。

出生地是小说家难以绕开的命题，人物、故事的气息密不可分地沾染着对初始环境的记忆。爱尔兰的阴郁、压抑一再为马丁·麦克唐纳提供书写凶杀案的灵感；成长于美国西北部蒙大拿州的梅尔·梅洛，笔下弥漫的情绪也同样空旷寂寥，漫无边际；更不用说马尔克斯的南美、沈从文的湘西。

而当你细看张贵兴书页中的热带奇象，就像亲身被绑在巨大的芭蕉树上，老鹰从你额前滑过，大蜥蜴逡巡眼底，身后传来树叶拨动的声响，也许猴子和穿山甲正上蹿下爬。你感到闷热、焦灼，在快要被水汽吞没前大口呼吸，却又难敌坠感和应接不暇的雨林诱惑，不由得睁大双眼，再看一看。

翻完这三百多页，就连负责此书在内地出版的编辑都大呼累。“他会用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形容词去描述一件东西，读的时候有很强烈的画面感，但不是马上浮现，要运用你的想象力。读起来很费劲，但读下来的感觉很畅快。”

像彻夜跳急促的探戈，筋疲力尽又兴奋难耐。你得撇开过往的阅读习惯，逐渐适应最长时一口气近 40 字的长句、前所未闻的动植物名词，以及人作兽、兽作人的眼花缭乱的颠倒比喻，有人劫后余生般感慨，“密不透风、浓郁瘆人。”

追溯这一风格的形成，要先讲一讲张贵兴的高中时期。他就读于马来当地的英文中学，英国文学课要求反复阅读《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暴风雨》《仲夏夜之梦》等原著，好些对白一度倒背如流。多年后，他依然视莎士比亚为“最早引导我走入文学殿堂的大师”，甚至“初恋情人”，“带给人的那种感情和激励，是不能够变的。”

等到他开始写作时，莎士比亚“每个句子都有比喻，非常华丽”的特性根深蒂固地流淌到他这儿。万物不再如初，云不能仅仅是白云——它原本脆燥，这时竟湿软得像稠粥。灰云如同紫菜，朝长屋（雨林中沿河而建的木屋）上空飘来的雨云则形似蜂巢、蚁窝、象粪；动物也情绪饱满——猪做出初长成的女儿娇样，鸭一脸闺怨，鸡像僧侣敷禅，狗肺怒张；甚至难以名状的语言都能用同样无影无踪的味觉、嗅觉来形容——米酒、香料、辣椒腌制的马来语、印尼语、印度语、达雅克语；充满树皮、草荄和泥土腥味的华语、广东语、客家语、福建语；雪茄、酒精和铅味混合的英语和荷兰语。

在新北市生活四十多年后，张贵兴早已染上纯熟的台湾腔，会把“蜗牛”念成“瓜牛”。八九十年代他和太太回故乡，被摊贩当作日本人；十多年后又被当地人用英文问，你是韩国人吗；2013 年在机场，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被认作大陆人。

自从父母亲过世，他回乡的频次越来越少。以前网络不发达时，他会特意叮嘱家里人将平日订阅的中文报纸收好，等他回去后要全部快速地翻一遍；如今他对家乡的牵挂丝毫没有减少，每天都会透过网络阅读砂拉越当地的三份华文报纸，并通过谷歌街景探视故乡。

容纳两三千人的小镇完全变了模样，木质高脚屋替换成了水泥洋房，商店、商场等现代化设施冲散了曾经的蛮荒感，在张贵兴看来，



砂劳越，伊班人村庄 资料图片

最明显的还是自然环境的改变。

打小居住的浮脚楼，四面八方围绕着凤梨园、玉米园、香蕉园、胡椒园和菜园，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芒草丛和雨林。以前茂密的榴莲树、菠萝蜜、红毛丹、香蕉树，如今已罕见。少年时期露营时看到的婆罗洲铁木、龙脑香科树种，还有箭毒树，现在也只能深入雨林才得目睹。书名“猴杯”即 monkey cups，源自一种他童年常见的热带肉食植物，因捕虫瓶里的汁液清凉可口、猴子爱喝而得名，又叫忘忧草、猪笼草。

植物的衰萎势必导致栖息其间的动物的锐减，《猴杯》里描写的动物大部分也来自张贵兴的童年生活。他清晰记得儿时从窗口随便就能望见大蜥蜴，抬头就能看到老鹰，水源被石油开采污染前，河里游着数量众多的孔雀鱼、攀木鱼、马甲鱼。按照长辈或客家人的习俗，闯入家园的动物是不吉祥的，每当看到老鹰在屋顶盘旋，一家人就得赶紧拿个破铜烂铁用力敲打，或者用力呐喊、驱赶。到了夜晚，常有迷路的豪猪或奇怪的鸟类进门，张贵兴笑着说，“若不是母亲阻拦，我家里大概可以开一个小型动物园。”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常常不自觉地在小说中切换成动物视角。《猴杯》的主人公名为雉，他的弟弟叫鸽，“我发觉我喜欢用动物的名字来帮人类取名字。当然，除了增加动物性，也希望可以拉近人跟动物的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们形容一个人的残暴，喜欢说他跟动物一样的残暴，但是这样子讲，对动物是不公平的，是很扭曲的。因为动物虽然残暴，但它不像人类的残暴，人类残暴是艺术性的，非常精致的，非常巧妙。”

用动物的名字称呼人，对张贵兴来说，可以看作是对人类的一种排斥。他认为，人类基本上跟猪笼草一样，也是一种肉食生物，只不过狮子、老虎是生吃，而人类搞了很多花样，把这个叫作文明。反之，用人的名字去给动物取名，在他心里，其实是把动物的地位给拉低了。

书中着墨较多的一头犀牛，他取名为总督。“总督的原文是 Rajah，在马来文里是国王、酋长，甚至独裁者的意思。Rajah 是统治砂拉越的第一代英国人，我特别用这个名字来取名犀牛，

代表他统治的、狂野的、非常野蛮的、没有人性的那一部分。”

历史越混沌，越适合小说家进场

清末民初，大量华人劳工来到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在他们的艰苦劳作下，一片片原始森林和沼泽泥潭被开发为种植园和矿区，市镇也随之建立。在此背景下，马华作家创作了一批表现华人艰苦拓荒的小说。然而，种植园主在不断开垦周围雨林荒地的过程中，必然侵犯到原住民的生活领地。张贵兴借助《猴杯》，聚焦华人拓荒史上的黑暗一面，即华人资本家对底层劳工的剥削与对土著居民的侵害，从而让马华文学中的拓荒史书写更为完整。

他的灵感来自一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黄乃裳。这位华侨领袖曾带领福州移民开垦马来西亚砂拉越的诗巫（又称“新福州”），他与乡亲们栉风沐雨地在荒凉的土地上白手起家，播种薯蔬五谷，引种橡胶，盖学校，修公路，建厂房，把当年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变成了砂拉越重要城镇和经济文化中心。黄乃裳终身与不良风气做斗争，在他的垦植厂，严格禁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最终他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

看完黄的历史资料后，张贵兴觉得这个人物似乎太正面了。“他之所以禁绝赌博、鸦片、卖淫，当然就表示当地的垦植厂原来就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书写这么一个反面的故事，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更有可看性，更能够带出比较深刻的问题。”

史料的缺乏，造成婆罗洲的历史模糊不清，包括婆罗洲有两个华人建立的王国，一个叫兰芳王国，一个叫戴燕王国，都是成立了将近 100 年，后来被荷兰人消灭。这两个王国的资料也非常欠缺。不过在张贵兴看来，历史的空白恰恰成了小说家的优势，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小说的价值得以凸显，可以天马行空地去填补细节，书写这一段失落、断裂的历史。

“强大的民族都有阴暗面，殖民主义让原住民沦为二三等人，东南亚华人被歧视，这些都成为了原罪。伟人、纪念碑有人写，但我更想描写枯骨与地狱阴暗。世界模糊，文献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历史人物都像幽灵，这时有人提着灯笼，希望能够照亮里面看不清楚的、非常黑暗的一部分，这个人就是写小说的家伙。”

他着迷于书写黑暗面，希望借此能够更清楚地看清黑暗。历史越混沌，越适合小说家进场。但他无意梳理历史，一再强调“我写的不是历史，我写的是小说”。

雨林为他提供了生猛旺盛的滋养，种种私密、珍贵的儿时见闻与成年的自己血肉相连，甚至可以相伴一生。他承认，《猴杯》有很大的自传成分。但这个自传并不局限于现实生活中吸食鸦片的祖父、混迹森林的原住民同学、一辈子没有头发的女邻居等情节上的相承，更多的，是精神上独一无二的、仅属个人的雨林感受和经验，就仿佛隐约觉得另有一个“你”活在那个时代。

在当地文坛，许多人觉得张贵兴书写的砂拉越跟他们认识的砂拉越不太一样，他们甚至说，这不是他们认识的砂拉越。他解释过很多遍，他写的是童年跟青年时代的记忆，就好像有些读者因为仰慕莫言就到高密县去看，却因与小说描写相差甚远而大失所望。莫言说，他写的是文学的高密，不是地理的高密。同理，张贵兴也常常说，“我写的是文学的砂拉越，而不是地理的砂拉越。”

莫言大部分作品他都看过，最喜欢的还是《透明的红萝卜》，“充满了生命力。你可以发觉他并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好像真的想要写一些东西，没有考虑太多就写出来了，这种写作方式充满着原始力量。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还有没有那种非常原始的创作欲望，推动我写一部作品，而不是为了写一个长篇而写，那种原始力量是完全凭感觉去揣摩。”

这种力量该如何保持、不被生活吞噬？张贵兴将过往 17 年不得已的暂停当成储备期，“这个力量很重要，就是要靠不断地阅读、思考、做笔记、写日记等等来维系。等你存积了一定的能量，觉得不写也不行，就一定会爆发出来。”



陈志勇
为那些离开故乡的人

“我想，离开故乡的经历会放大人的全部情感”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胡佳璐**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母亲是从爱尔兰移民的澳洲人，妻子是定居澳洲的芬兰人……澳洲华裔绘本作家陈志勇的家庭几乎自成一部移民史。

“陈志勇”是爸爸给他的中文名字。在英文里，他姓 Tan，这是“陈”姓在福建、潮汕一带的发音。他只会些许中文，水平停留在儿时的周末汉语补习班，但他喜欢自己的中文名，知道那是一个充满决心和毅力的名字，有时候，他会把“勇”字藏在自己绘本的角落里。

这名字似乎预言了他的性格。《失物招领》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奖后，大家都知道了动画背后十年磨一剑的故事，而那个十年磨一剑的人，正是陈志勇。画面中透出的想象奇诡、温情又细腻，顺藤摸瓜找来这个叫陈志勇的作者的其他作品，如一地惊艳。

“你自认天生想象力丰富吗？”采访时我问他。他否认了，回称如果说自己有什么天赋，那也只是比别人更执着，执着于“把事情做完”。

陈志勇（Shaun Tan）
1974年生，澳大利亚华裔绘本作家、插画家，2020年英国Kate Greenaway童书奖得主。作品《失物招领》获得2010年奥斯卡最佳短片。曾获2007年世界奇幻奖年度艺术家、2011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纪念奖等诸多世界级童书大奖。代表作《抵岸》《绯红树》《兔子》《别的国家都没有》等。

陈志勇画得最多的，是外来者的故事。获得诸多国际大奖的绘本《抵岸》，用奇幻的方式画一个男人融入陌生地域的过程。它脱胎于陈志勇和身边人的移民故事。从画草图、绘制到最终成书的五年时间里，他一直断断续续做着采访，和偶遇的出租车司机、留学生、家人朋友——他们要么是移民，要么是移民的子女，可能来自尼泊尔、埃塞俄比亚、中国、巴西、俄罗斯……这在澳大利亚非常普遍。

一开始，他试图在这些移民故事中寻找共性，某种普遍化的经验。但随着采访和口述史资料的深入，他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为此他在书里加入了“二级叙事”展示人们离开故土的不同原因：暴乱、战争、经济……

“我想，离开故乡的经历会放大人的全部情感。”能激发他想象力的往往是一些生活琐事，比如妻子曾在厕所看见老鼠——于是他把一只白色生物画进移民公寓里当作陪伴；一位罗马尼亚的难民形容家乡被政权压迫“吸走”精神的感觉，“好像连树上的鸟鸣都被吸走了”——于是他在故事里画下带有真空吸尘器的巨大生物摧毁一个城镇的故事。

陈志勇的父亲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华人村庄，像所有父亲一样，他会在不经意间提起并反复讲述那些儿时的故事：椰子种植园、中国的新年、丛林探险、家里做的蛋糕生意、掉进井里的故事、表哥把钱从藏好的罐子里偷出来的故事、管姑姑叫猪而被爷爷用棍子打的故事……母亲也是讲故事的好手。在他们的学生时代，“白澳政策”这一公开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仍然存在，只允许白人移民流入，如果不是与身为白人的母亲结了婚，他的父亲很可能无法在澳洲永久居留。

直至 1973 年，白澳政策正式取消，但时至今日种族主义仍未消弭，比如对澳洲土著人的剥削与暴力。“他人的困苦总照出自我生活的安逸，”陈志勇说。在澳大利亚珀斯郊区长大的他形容那是“一个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地方、一个被遗忘的地方、一个既美丽又对殖民历史悲剧失忆的地方、一个光明与黑暗共存的地方”，而作为一个执画笔的人，他愿为失语者发声。

《抵岸》内页





1

人 人物周刊　陈 陈志勇

我们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却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人 不管是在《抵岸》、《兔子》还是在《蝉》里，你似乎都对少数群体有着持久的兴趣和同情。这是否与你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

陈 当然，但具体如何影响的很难说。在我完成《蝉》后，我发现它的部分灵感来自于我父亲的工作生活，以及他身处的澳大利亚少数群体文化。比如说，蝉说的是蹩脚的英语，很多读者认为这象征着蝉是移民。或许是或许不是，但至少从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族裔移民的弱势境遇，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剥削、虐待，被剥夺应有的权利。《兔子》、《抵岸》也是关于移民的书，但角度不同，《失物招领》、《艾瑞克》也是如此，可以说它们都是关于外来者、孤独者、失落者或背井离乡者的故事。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总会兜兜转转回到这个主题。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迷失者，尤其在青少年时期，不过后来又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如此。虽然我的文化背景在珀斯有点不寻常，但也并非个例，而且我算是来自相对优渥的家庭，并没有遭受过巨大的不公正或权利的剥夺，也没有移民过，所以我不能说这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我想，人是可以对与自己不同的人抱有极大同情的，他者生活的困苦、境遇的恶劣总会照出自我生活的安全与安逸。

我也确实认为，作为一个有讲故事和画画天赋的人，我有一定的责任用这些技能去讲述那些原本可能不会被讲述的故事，给失语者多一些声音。我想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明白作为少数、被排斥、被冷落或格格不入的感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也是诸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人权运动的目的：让大多数人认识到、哪怕只是简单地去想象少数群体的生存境况。我们活在同一个星球之上，却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人 在《抵岸》的创作过程中，你是怎么想到要把那些移民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一个异想世界里的？你还创造了一套陌生的文字系统、交通工具、宠物、蔬菜和水果，就像《失物招领》里一样，这个过程对你来说一定充满乐趣，但会不会很困难？有什么技巧？



2



3

1.《蝉》内页
2.《兔子》内页
3.《失物招领》剧照（2010）

A 在《失物招领》中，你会想象自己扮演哪个角色？是男孩还是迷失的东西？

陈 我真的只对那个男孩感同身受，他的原型是少年时代的我——有点孤僻，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收集物品，而不是和朋友交往（虽然《失物招领》里的主角有一个好朋友 Pete，这也是根据我在珀斯的一个高中老同学改编的）。就像电影里男孩帮助了那个迷失的生物，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相遇的意义。我想我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如此，我总是后知后觉，太晚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意义，而且通常是在画桌上才发现的。

不过我注意到，很多读者都对那个迷失的生物感同身受，这是我作为创作者意料之外的。我想这就是虚构故事的力量吧，人们可以根据多样的个人经验，在故事中找到意想不到的意义。那些因为残疾、性别、宗教、种族或其他任何差异而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人，往往会在《失物招领》中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

Q 与其说我想把移民故事放到一个奇幻世界中去描绘，不如说我对陌生的奇幻世界感兴趣，并因此寻找相关的故事——移民故事很明显吻合，他们都是陌生土地上的外来者。很有趣的是你在这里提到了《失物招领》，这本书比《抵岸》早得多，而《抵岸》的创作思路之一正来自于想象生活在陌生的“失物之国”——比如《失物招领》结尾的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会如何理解人、如何吃饭、如何找地方睡觉、如何建立关系、如何工作？这些正是移民面临的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主题找到了我。

陈 创造虚构世界很有趣，我最喜欢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从《星球大战》里学会的一件事是：不必展现所有的东西，而是要用很少的东西来营造浩瀚之感。创作的这些年里我体会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寻找现实事物的想象等价物，不管是羊还是船，是钱还是蔬菜。我需要仔细思考真实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调整它的外观，保留它的基本功能和意义。无论多离奇的生物或景观，都必须建立在日常现实的体验上，这样才能使幻想中的图像具有真切的存在感和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构是真实的另一种再现。

A 动画的结尾部分展示了一个神奇的失物之地，对你来说，你丢失的东西是什么？

C 那些我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我总有一种感觉，我对世界的认识是很浅薄的，我只看到或了解了眼前出现过的不到百分之一的东西。失物之地几乎就像现实的真实面目一样，它就在那里，但你看不到它，因为被现有的信念和狭隘的知识所限制。但我认为你可以一点一点地扩大理解的范围，特别是通过艺术和文学，通过保持开放心态的纯粹努力。这并不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如此。

恐惧是童年里一个重要且必要的部分

A 在《绯红树》中，我注意到每张图片中都有一片红色的枫叶出现，只是出现方式不同；《夏天守则》中也有一只类似的黑色乌鸦。在我的理解中，这是希望或恐惧的隐喻，它们在情节上有实际的功能，比如当故事达到高潮时，枫叶会长成一棵枫树，乌鸦会从一只变成一大群。你是刻意设计这些意象的吗？你画它们的本意是什么？

C 在这两本书里，这些符号（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因为它们没有特定的意义）其实是创作后期才出现的。比如说《绯红树》的创作，我一开始就知道结尾会有一棵树或类似的意象，但直到我画完一些相当压抑的画面后，我才意识到每个画面都需要一些树的元素作为暗示与铺垫，所以我在每张图片中都补了一片小小的红叶。故事中的女孩直到最后才看到那片红色枫叶，只有读者知道它一直都在。这在图画书里可以做得非常巧妙，在其他媒介上很难做到。

在大约时隔 12 年后创作的《夏日守则》中，也有类似但恰好相反的设计。乌鸦有点阴险、黑暗，很隐蔽，如果没意识到它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你就在默许它增长力量，围绕在你周围。我想绯红树和乌鸦群有一定关系，但我并不希望由我赋予它们特定的某种含义，读者们一样可以很好地理解到。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符号”不是直白的、简单的好或坏，它们只是一些事物，会离开、会回来，好也好、坏也好。书中的乌鸦其实没做过任何坏事，绯红树也从未真正做什么好事，它们只是在那里，邀请你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思考，仅此而已。我想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并不具有满载的符号或固定的意义，相反它是任人诠释的中立之物，你可以选择用消极的方式诠释，也可以用积极的方式。

A 其实我不太理解《夏日守则》的故事，尤其是红衣男孩和白衣高个男孩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父子还是兄弟？这是一个关于宽恕的故事吗？我读它的时候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这个夏日故事一开始就被黑色的乌鸦和粉红大兔子的凝视弄得有点可怕，为什么你要用暗色调来画这样一个夏日假期？

C 好问题。我听过不同的解读，有一个读者的解读很精妙：这两个人物其实是同一个人，更年长的那个在回想儿时犯的错误，或试图调和自己的不同面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读。故事的特点就在于它们不是真实的，他们就像梦一样，阐释空间是开放的。我自己的感觉是两个男孩是兄弟关系，它们基于我和哥哥一起度过的童年的记忆，虽然他从来没有书里那个高个子男孩那么霸道，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肢体冲突。

不过，我不希望这个故事只是关于兄弟的，它其实讲述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仅此而已，他们可以是父子、朋友、兄弟，甚至我



陈志勇（右）和安德鲁·鲁赫曼凭借《失物招领》获得2010年奥斯卡最佳短片奖



《夏日守则》内页

有点希望他们是无性的，可以是姐妹或情侣。我只是用了兄弟的形象，因为那就是我知道的。

另外是的，这是一本有点恐怖的书。我印象里童年经常是恐怖可怕（Scary）的，成年后也是如此！

A“可怕”？

陈 我想我是在泛泛地说童年是一段可怕的时光（当然也有乐趣、有爱等）。恐惧是童年里一个重要且必要的部分，成年后也是如此。我们总是花很多时间试图避免或压制恐惧，或者让别人代劳，但恐惧依然存在，我认为艺术和文学是面对、思考、讨论恐惧的一种安全方式。

当然，这也是一本关于宽恕的书，虽然书里从来没有明确说过。我不确定书里的一个角色是否有向另一个角色道歉，是否足以被原谅。在我小时候，我和哥哥之间往往就是这样，我们从来不会正经道歉，但每次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事情来缓和关系，通常最后只是一起看电视，而无所谓是否道了歉、是否原谅，就像书中一样。

A《绯红树》里的忧郁感很触动人，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如果有，那棵绯红树对你来说是什么？是什么促使你创作了这本书？

陈 是的，我曾有过多次抑郁的经历，虽然很少达到很严重的程度。我觉得这些低落的情绪往往会伴随着创作过程产生，就像灵感来临时的复调，不管你是不是艺术家都会有这种感觉。绯红树对我而言真的不意味着什么特别的东西，哪怕有，也只是那种恢复的感觉（根据我自己

的经验，抑郁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后自行解除，当然对其他人来说，可能需要一些努力）。但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抑郁的，它可以是关于任何负面的情绪，甚至是相当温和的感觉。而且最后的最后，这些情绪都一定会变化的。

这本书起初并不是以忧郁情绪为主题开始的，我原本的出发点是展示一系列更普遍的不同感受，并以梦境般的图景来展现。但慢慢地，我发现负面感受的画面远比正面感受的更有趣，尤其是孤独感和悲伤感。我想从这些负面感受的经验中作画，几乎是作为一种使它们“有用”的方式。那些负面感受不一定是浪费时间，它们可以是一种有用的经验。

诀窍永远是开始动笔

A 平时你的创作理念从何而来？你是否有某些与创作有关的习惯？

陈 我觉得主动研究是发挥创作力、寻找灵感的关键，在日常生活中，除非我去尝试，否则我不会有真正的灵感。我要么会坐下来拿着素描本，要么会决定就某一主题写一个故事。我想把这个作为日常习惯，但很难，尤其是在最近疫情期间要照顾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但当我有时间开始创作时，一切都从笔记本上的钢笔草图开始，然后慢慢清晰起来。这是一种相对简单且没有压力的开始创作的方式，而诀窍永远是——开始动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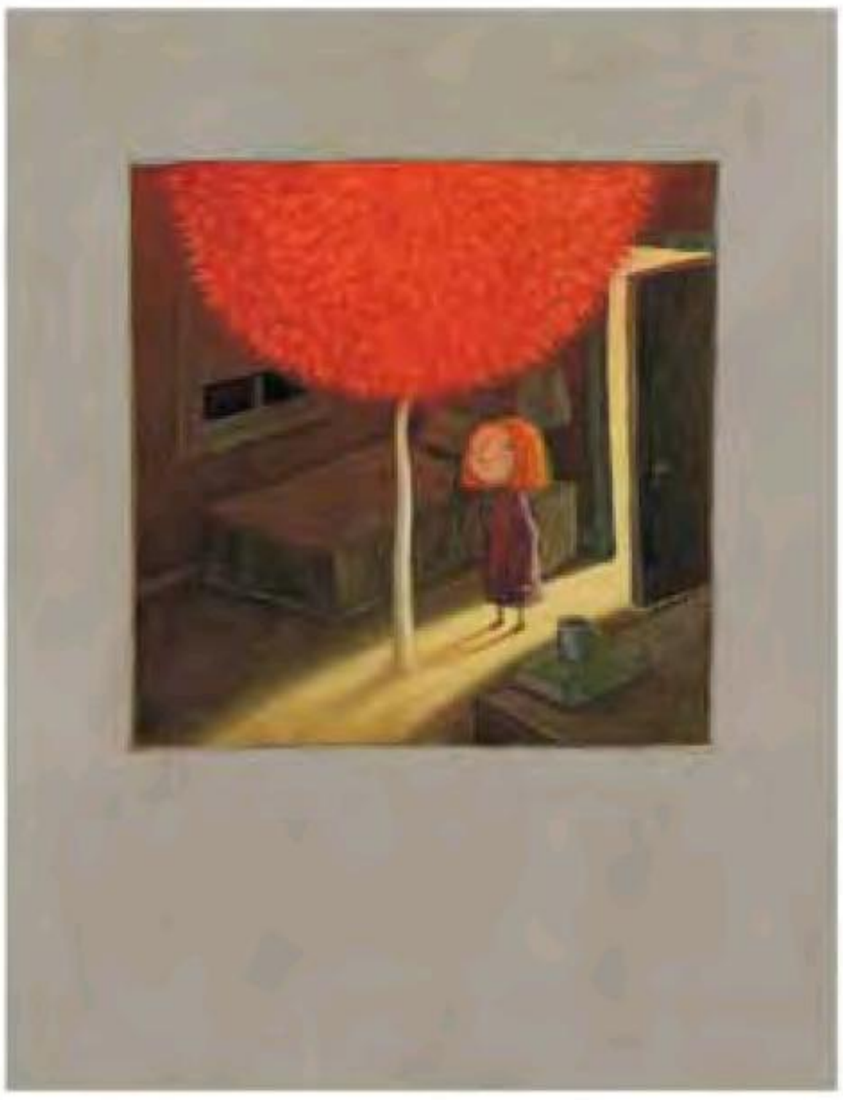
A 在你看来，想象力更多的是一种天赋，还是可以打磨和提高的？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从小想象力就很丰富的人吗？

陈 我不认为我的想象力在潜力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只能说我在将事物可视化方面有一些技巧，这是从父母那里得来的（我父亲是建筑师，父母都非常擅长画画）。至于想象新事物的能力，那当然是随着不断的实践、受教育以及在家人、朋友、同事和读者的鼓励之下逐渐提高的。我的书有广泛的读者群，这于我而言说明我的想象力远非独一无二，因为故事只有在读者心中才能真正展开。

至于打磨提高想象力，这和其他任何事情都一样，需要靠反复的实践和尝试，学会经常倾听自己的潜意识，培养良好的直觉，这才是真正的“创意引擎”。那些在潜意识下冒出的想法和梦境就像安静的耳语，你要想办法倾听并认真对待它们。同时要学会诗意地思考、跨类别地思考。我认为大多数艺术都是运用隐喻的方式进行创作，艺术家们能够注意到两个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如天空像一个贝壳，一棵树像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或者一栋房子就像一个人的脑袋。尝试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思考它们的关系，这是一种锻炼想象力的好方法。

A 在创作过程中，哪个环节最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

陈 最漫长、最困难的部分是创作插画的“中间阶段”，它介于最初的涂鸦式构思和最终完稿之间。这个阶段充满了不断的重画，这往往会偏离我最初构思的乐趣，进入到让我难以决策的境地。这条线比那条线好吗？这个颜色比那个颜色更真实吗？这个构图为什么不行？为什么



《绯红树》内页



感觉虚假和造作?

这实际上是非常枯燥和令人沮丧的，但我认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家必须在艰难的创作中始终保持信念，有时甚至需要经历深沉的抑郁。快完稿的时候，往往会证明万难皆值得。不总这样！但经常如此。

A 你在大学里主修艺术理论，这些知识是否会反映在你的创作中?

C 我尽量不使用太多符号象征或参考资料——太多的艺术知识有时反而会成为问题。我相信观众应该能够在不了解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欣赏艺术作品或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儿童是很好的受众。

《别的国家都没有》内页，
“我们的周二午后读书会向您致以温暖的问候！”

我真的不喜欢“编码”艺术的精英主义，它暗指普通读者可能不知道的复杂思想、理论和知识风尚。研究过很多之后，它现在让我非常恼火，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表达失能。好的艺术作品应当能够被广泛理解，这也是我对“好的艺术”的定义。

A 你是否曾怀疑绘画的意义？最想通过你的作品向这个世界表达什么?

C 的确，我一直在思考绘画和故事的意义，有时会得出结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或随心所欲的努力。但我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些感觉，开始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转瞬即逝的——甚至有时是真的——但我还是会继续下去。和其他任何活动一样，如果创意工作变得令人沮丧、疲惫，那么从中抽离、休息一下也是好的，我确实需要时间给感情和想象力充电。

至于想向世界表达什么东西，其实我尽量不去想。我只是专注于向自己表达一些东西，或者试图表达自己对看到、听到、读到的东西的感受。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你必须假设自己知道得不多，且无论如何都要谦虚而好奇地尝试了解一些东西。要学会去尊重这个世界本身的逻辑，世界比你更了解它自己。

A 如果不做画家或艺术家，你还想成为什么?

C 很可能是科学家，尤其是与自然和环境有关的科学家。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大学里差点学了基因工程，我预料那将是下一次技术革命。其实我和我父亲很像，最让我们开心的事就是园艺。我觉得画画和科学研究、园艺有很强的相似性，当你试图以某种方式接近那种与自然相结合的状态时，既需要理性的思考也需要感性的体会。在此过程中，你会获得特殊的感觉并彻底忘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或是感受到自我与更古老、更长存的事物的纠缠与瓜葛。我们都只是在帮助事物成长，并在时光里展现它们。

气候变化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存更具威胁

——专访《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有国家都承认自己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我能预想到的最好局面是：在未来一两年，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新冠病毒，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和出路。一旦人类携手合作来抗击这场大流行病，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它会启发我们如何合力来解决气候问题、资源枯竭、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以及其他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从这一角度出发，新冠疫情的悲剧从长远看反而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正面的、好的后果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贾雷德·戴蒙德

世界知名博物学家、作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理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作品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等，新近引进中国的有《剧变》。

1987 年，50 岁的贾雷德·戴蒙德成为一对双胞胎男孩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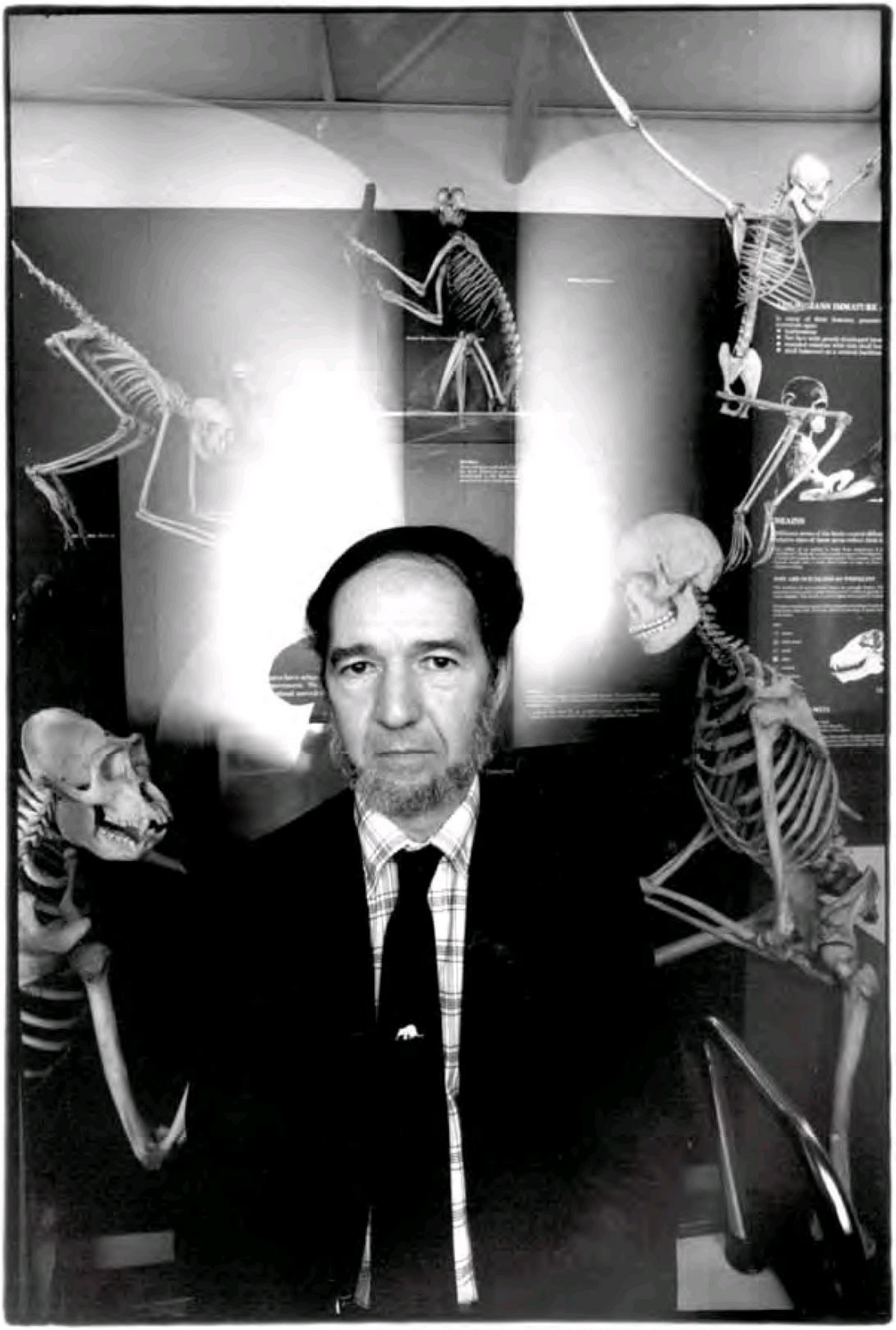
这位颇有建树和声望的教授沉浸在初为人父的一片喜悦中。他一直是一位勤奋、具有独创性、视野极为开阔的思想者，早年以生理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此外，他尤其喜欢并擅长从生态、地理和历史角度思考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演化和变动。

怀抱着两个幼嫩的新生命，他忽然意识到一点：无论在实验室研究胆囊生理学，还是在新几内亚等地追寻绝迹的鸟类，过往的这些研究无论多么令他乐在其中，孩子们的明天却并非取决于这些，而是取决于这个世界是如何、将如何。

从这一天起，戴蒙德开始事业生涯的第三次拓展尝试——从自然科学家的角度出发，写作关于人类历史、社会和地理方面的科普书籍，和更多人分享自己对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思考和研究。

三十多年来，他完成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科普著作，获得大大小小的许多奖项。1997 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他最成功、最有知名度的代表作，摘得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至今在全球仍畅销不衰。以本刊记者这样一个教育背景、职业身份为例，环顾四周，我身边几乎每一位同事、朋友和熟人都读过这本书，在日常聊天和相对严肃的讨论中，也经常会有人引用书中的观点、论据。

如今，82 岁高龄的戴蒙德和妻子居住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处峡谷附近，他依旧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给本科生讲地理课。每天，



1992年7月，戴蒙德在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观看“人类的进化”展览　图/Steven Siewert

他都会从家中出发去观鸟，一周数次在健身房举铁，每周参加一次意大利口语课，还在一个古典室内乐团里负责弹钢琴。

他仍保持着头脑的敏锐与创造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流露出对暮年的清醒认知，并为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当下这场困扰全球的大流行病已夺走他身边多位好友的生命，他为之伤感，但是认为："人类有远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难题和危机。"

戴蒙德生于 1937 年，童年在"二战"中度过，后来到欧洲求学、深造，在冷战阴云下的欧洲有多年的生活经历：他曾坐着地铁从"自由"的西柏林游荡到"红色"的东柏林，近距离观察了北欧小国芬兰是如何在两大阵营的夹缝中求生存。而在南美、东南亚旅行、工作时，他看到这些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如何在革命、军事独裁和民主重建的反复中挣扎……

新近，他花费六年时间撰写了新书《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在心理学和个人心理辅导的启发下，以他曾生活、旅行过的七个国家（德国、芬兰、日本、澳大利亚、智利、马来西亚、美国）为案例，探讨国家层面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与得失。

在被疫情、脱钩、冷战困扰的 2020 年，这些来自人类历史的经验梳理和总结显得格外应景。

基于此，本刊记者辗转联系到这位擅长从历史角度审视人类文明的著名思想家，给他发去一份列有十个大问题和相关小问题的采访清单，涉及到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与"机"，中国在当下的困境和出路，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和社会冲突，"新冷战"下"第三类国家"的生存策略，区域性合作组织的角色和作用……

戴蒙德挑选其中若干问题做了简要的、跳跃性的书面回复，这部分是出于一名自然科学家的严谨，部分或许是因为必须小心翼翼绕开"雷区"。但是，他十分坦率地谈到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诸多不满——"如果今年 11 月大选特朗普获得连任，不仅仅是我们美国人的一个大悲剧，也是全世界的。"

人 人物周刊　戴 戴蒙德

人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你把外来征服者（和他们带来的驯化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视为一种比枪炮、战争更具杀伤力的东西。不久前，您曾公开提到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有远比 COVID-19 病毒更具威胁性的，譬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但是，眼下这场全球大流行病带来的最大问题不仅仅是死亡率，它还激化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隔离，社会的混乱和失序，一个所谓的"新冷战"时代似乎加速临到。对于 COVID-19 带来的复杂影响，您现在的认识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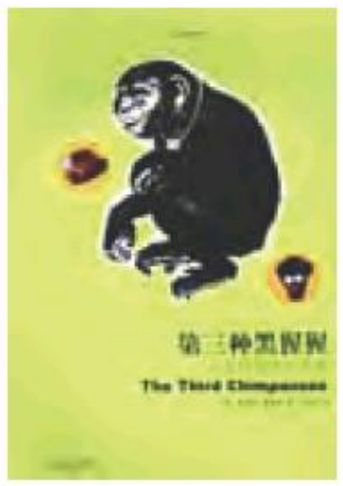
戴 是的，COVID-19 病毒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死亡、冲突、敌意，以及社会的混乱和失序，这是我所能预想到的最坏的局面。然而，我所能想到的最好情形是——这场大流行病有可能在中长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有国家都承认自己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正如你所提到，我们还有比新冠病毒更大的危机和挑战，譬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全球性的不平等。但是，这些挑战并没有激发全球性的反应——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在短时间里、明确地将人类杀死！但事实上，气候变化已杀死、并将继续杀死人类的数量要远远超过 COVID-19 病毒，是通过使粮食减产、热带疾病扩散、空气污染和其他糟糕影响。当气候变化导致粮食减产时，一些人会死于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但受害者不会说他们是被气候变化问题杀死的！他们会说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食物，不会想到导致他们缺乏足够食物的原因是气候变化。

新冠病毒会在短期内迅速杀死感染者，死因非常清楚。人们会更普遍地把新冠病毒视作必须严阵以待的一个大问题，而不是气候变化，尽管事实上后者对人类的生存更具威胁性。新冠病毒是全球史上第一个人类公认的全球性问题，每个人都认同：它是一个全球性大问题。

我能预想到的最好局面是：在未来一两年，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新冠









病毒，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和出路。一旦人类携手合作来抗击这场大流行病，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它会启发我们如何合力来解决气候问题、资源枯竭、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以及其他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新冠疫情的悲剧从长远看反而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正面的、好的后果。

近期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因为弗洛伊德事件而激化，出现一股对“政治正确”的极端诉求，包括推倒历史名人像、对公众人物言论极为苛刻的要求。在像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大国里，种族矛盾也许是无法避免和彻底根除的。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一矛盾和冲突在今年变得这么苦涩、这么有暴力化的倾向?

是的，在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种族冲突现在引起很大的社会关注度。但是，当现实冲突实为更为深广的社会问题时，如果我们只聚焦于种族矛盾，或者把种族矛盾简单归因于外来移民，那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冲突是南北战争，这场内战中死亡的总人数比美国历史上所有其他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得多，它主要是美国不同白人移民群体之间的一场战争。如果按日均死亡人数占人口比来衡量，20 世纪有两场最严重的内战，其一是 1918 年的芬兰内战，是本土芬兰人中保守的一派和自由主义一派之间的冲突。另一场是 1936–1939 的西班牙内战，死亡人数高达百万，它跟种族、移民这一类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当下面临的种族冲突问题，其实只是今天美国社会所面对的诸多冲突类型的其中之一。这些社会矛盾都和美国过去 20 年不断加深的政治极化有关。至于今年为什么会变得格外苦涩和暴力，部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总统，他总是致力于挑起一部分美国人仇视另一部分美国人——要么在不同种族之间，要么在移民和非移民之间，而不是致力于减少美国社会已存在的苦涩和暴力。

政治极化的确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在美国，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剧变》中，您将之部分归因于定制信息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我们到底该不该打破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
您对特朗普言行和政治决策似乎有许多不认同。美国的大选即将到来，您对下一任美国总统和新一届政府有什么期待和要求么?

我们能做什么来突破“信息茧房”？这不只是美国也是其他国家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它需要好的政治领袖们对之做出重要贡献。如果特朗普在美国 11 月份的大选中再次当选，将不仅仅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世界的。他会使得“信息茧房”的问题加剧，而不是打破它。

在一个政治极化的社会里，一个好的国家领袖会把人们凝聚起来，通过强调让国民为之骄傲的国家特质。他是把我们连接到一起，而不是让我们彼此撕得四分五裂。我们美国是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伟大特质：譬如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投入巨大并且成就非凡，我们拥有出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国民的构成几乎完全是外来移民及移民后代（甚至所谓的“土著美国人”也是 13000 年前的外来移民！）。要知道那些会作出移民选择的人通常会更有勇气、

更加雄心勃勃，也更有冒险精神，他们确实为美国的成功做出过了不起的贡献。我们具有的其他优势，包括拥有世界上最辽阔肥沃的、可作农垦的土地，世界上最丰富庞大的内陆河流体系，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疆域，没有具有威胁性的邻国接壤。

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听特朗普说的那些话，他不知道我们美国人是被这些我们共同的优势凝聚在一起的。我们下一届美国总统肩负的最大任务，是不断地提醒美国人我们所共同拥有并为之感到骄傲的长处和强项。

我被你在《剧变》一书中分析的芬兰案例所吸引。历史上，这个和俄国接壤的北欧小国在地缘政治上一直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冷战时期处于两大阵营的夹缝之中，但最终通过赢得苏联的信任、同时从西方盟友获得援助，维护了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国民的幸福指数也一直非常高。

如果全球化速度放慢了，所谓的“新冷战”启幕，对那些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第三类国家”该如何应对，譬如像新加坡、韩国这样的“小而强”的国家？在外围环境变得如此高度不确定的时刻，什么是它们的现实、可行策略？

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若干个人口以及经济总量庞大的“超级大国”，如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小而强大”、对国民投入巨多的国家，譬如新加坡、韩国、芬兰、以色列，它们对世界做出了远超过他们所占人口比例的贡献（记者注：戴蒙德只陈述了他对此的观察，没有就记者所提问题作答）。

如果所谓的“新冷战”真的到来，那些区域性合作组织，譬如东盟、欧盟呢？他们会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你的关注点很对，注意到了像欧盟、东盟这样的区域性组织在全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欧盟成员国的总人口数超过了除中国、印度之外任何单个国家的总人口数。而且，许多欧盟成员国在经济、科学、技术上都居世界领先之列，所以我是希望欧盟能成为未来全球格局里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许多朋友生活在欧盟国家，就目前而言，他们中有许多人看到欧盟内部不和的迹象，因而对前景持悲观态度。但我比我的这些朋友要乐观得多。相比欧盟，今天美国国内有更多的不和和冲突。

你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在中国有广泛的知名度。今年，你论述国家层面应对危机的新作《剧变》也被引进到中国。我还是想问问，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强烈的国族和文化认同以及创伤历史记忆的大国，身处当下这种矛盾尖锐的国际环境，您可有一些观察和思考？是否愿意给出一些建议呢？

很自然地，我没法给中国提供“建议”（advice），因为每个中国人都比我更了解具体的中国！但是，我可以给出一个建议（suggestion）——那也同样适用于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年代，没有一个国家能保持自身的强盛和快乐，如果有国家一直处于贫穷、心怀不满的状态。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会影响到每一个具体的国家。

您已经 82 岁了，仍然保持着思维的活跃度和创造性。经历了这么多、“看”到了人类社会这么多起伏兴衰，您个人对未来的世界和人类有怎样的愿景？

我对这个世界的愿景，是希望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们携手合作，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也有很“自私”的利益考虑，因为这个世界也是我妻子、我两个 33 岁的儿子所生活的世界，他们有很大可能性在 2050 年、2060 年甚至 2070 年还活着，而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对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愿景：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人从科学、历史、地理中找到令人兴奋的、我们能从中获得裨益的新发现，然后有更多的人读到这些内容。正是这些有趣的、令人着迷的东西，是我花费三十年投入写作的动力——我想和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分享我所发现的那些世界的奇妙之处。

独具匠心

设计小清新



我们把“未知”作为理性思考的代表，诚恳地印在包上。

“未读”书籍里的智慧，“未知”哲理的思索。

你需要一份理性的自我空间。

在人人必须跟随潮流的时代，

重磅新闻必须“已知”，微信消息必须“已读”，



扫码即可购买

HAYA 乐团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实习记者 胡佳璐 发自

HAYA 乐团有生以来最美妙的一次演出，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他们在半山腰上搭起了一个舞台，舞台后面是上万匹骏马。“一万多匹骏马散落在草原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草原有多么大。我们以天地作背景，以一万匹马作背景，去唱歌，去演奏，去跟那里的牧民分享我们的音乐。”

提起草原，HAYA 的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天几夜。他们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孩子：乐队主创马头琴手张全胜是来自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吉他手陈希博是带锡伯血统的蒙古族，主唱黛青塔娜是来自青海的蒙古族，打击乐手宝音土生土长在巴林草原，冬不拉手穆热阿勒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老家在那拉提草原……

宝音说，传统草原的清晨，安静得叫人害怕，静得能听见蚊子飞。出门全是草，草上全是露水，一踩准湿透，得穿马靴跟着羊群踩羊走过的一个个小脚印，等到太阳暴晒前必须返回。牧民永远知道自己的羊几点钟在哪里，看一眼就知道少了几只。

阿勒说，那拉提草原一眼望过去是分层的，蓝天映衬白色雪山，远处是深绿色的山，近处是浅绿色的草场。草场迁徙时，在马背上骑一整天，屁股都被磨烂。

但他们也眼见着草原的退让和失守。黛青塔娜长在青海海西柴达木盆地的一个小镇上，一点点见证着草原被油田侵蚀。爸爸的草原在青海与新疆交界处，从小爸爸会跟她说，那时候的夏天若是天气允许，他们都不愿住在蒙古包里，每个人都带上自己的羊皮袄选一个喜欢的地方露营。外面是漫天星光银河，远处的湖上有天鹅和各种鸟类，能听见小虫子在草丛里蹿动。可五岁那年，当爸爸第一次把塔娜带到自己长大的草原，她看到的只有沙漠和几根草在顽强地奋力生长。

那是黛青塔娜第一次感觉到悲伤。“那种悲伤不是一个孩子没有得到玩具而悲伤，或者是



图/受访者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草原

北京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想爸爸妈妈而悲伤，是我第一次看到一片土地，让我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难过，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

很多年后塔娜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群人在拉弦乐，有一根弦的声音很特别，紧而高，但她想不起来该怎么形容。说起这个来的时候，她和张全胜正开车堵在北京长安街上，两个多小时刹车踩了又放放了再踩，张全胜说，是不是这个声音——“zing”，“zing”，“zing”。

是刹车片摩擦的声音。张全胜用手敲击方向盘打起了节奏，俩人在车里唱起来。那成了HAYA乐团后来的《迁徙》。

张全胜想到的场景是，可能再过一百年或者五十年，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老了，坐在草原上想唱一首古老的歌，却想不起来旋律。旋律本该非常欢快，可唱出来已经不成调。小姑娘很老了，整个草原也很老了。再后来的人知道的只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草原。

离开与重启

张全胜从小想的就是离开草原，离开那个没有电没有汽车的地方。

他在内蒙古新安盟科右前旗察尔森公社出生长大。只有十几户人家，去哪都得骑马、坐牛车，吃个玉米饼从种植、收割到磨面、粗加工全要靠人力和牲畜。长大后他如愿以偿：1985年进入内蒙古艺术学校，1991年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毕业并留校任教，认识了腾格尔，1993年组成“苍狼乐队”，琢磨民乐与电声的融合。

那时候他靠自己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在

STAR 明星

“是谁啊是谁，是谁让大地露出黑色的血液？”“嘿，有你啊，有我”





他人眼里已俨然成功者：第一个在大学开设马头琴专业，第一个把民族和现代流行音乐结合，第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拉响马头琴……

然而光鲜背后，是身体的疲惫和虚无。他隐约感到，这似乎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音乐的感觉。在日本演了六百多场演出后，有一次他终于病倒，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自那以后，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爆炸。再然后，他放弃了 13 年的房子、车和存款，重新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那时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一到下午四五点，手心出汗、心慌，感觉灵魂被抽走、意识消失，是濒死般的感觉。后来他租了一个 30 平米的小房子，一个人过了一段没有演出没有钱的生活，每天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究竟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才是我自己的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应该怎么度过？"

HAYA 乐团便在这样的情境下诞生了。在蒙语里，"HAYA"的意思是边缘。张全胜的血管里流着蒙古族的血液，但他并不愿把自己局限在蒙古族的音乐里，以此为根基，他希望更多元的音乐一起融合，不分族群、不分地域，消弭国别地界，创造出更新的一种音乐形式——这是他理解中的"世界音乐"。

要融合不同民族与现代的乐器并不容易。民族乐器不如西洋乐器标准化，比如马头琴，天气、温度、湿度都会影响弦的调音，如果不做改良调整，在不同乐器之间调和音调、音色就是一件不可控的事情。HAYA 第一次开演唱会时，本来上场前已经给蒙古族的弹拨乐器对好弦，结果演出一开始，键盘还是定好的调，弹拨乐器却突然高了小三度，马头琴也变高了二度。

"整个就不在一个调里面！"张全胜摇头。

除了民族乐器的改革，音乐风格的找寻也是大问题。录第一张专辑《狼图腾》时，HAYA 全员都是男性，音乐风格相较如今更为实验性，无论听众还是亲朋，给到的反馈几乎都是疑惑："哎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音乐呢？为什么不唱大家都能听得懂的那样一种音乐？"

张全胜心想不对，这绝不是他想要找寻的声音。

迷失与寻找

黛青塔娜那时还只是 HAYA 的文案，偶尔伴唱。

18 岁时，她从青海考去了北京，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却不会唱歌了。学校教授的是一整套让她感到陌生的西方发声方法，她依草原传统学来的蒙古长调唱法，被老师认为是错误的，"喊来喊去的。"

塔娜在这大城市里迷了路。她的祖父母、父母都曾是部落里最好的歌者。小时候的塔娜其实特别不爱听妈妈唱歌，因为"和电视里唱

的不一样”，不时尚。但回想起来，那时的母亲已经开始在搜集民歌了。母亲拿着黑砖头般的大录音机，拿着哈达、酒和礼物，骑着马到草原上找还会唱民歌的老人。老人们也已经很长时间不唱了，得一直和他们聊天、喝酒、聊过往，聊着聊着才可能忽然想起某首歌就唱起来。

母亲最后录出来的全是碎片，每个人唱的感觉都不一样，她会把同一首歌的各种版本一点点凑出来，然后自己模仿着唱，就这样录了一盘磁带。

直到长大后黛青塔娜才明白母亲做这件事的意义，也开始向母亲去学那些生长于草原的歌。那些草原上的传统，怎么就错了呢？

迷失的也许不只是声音。大二那年回家，她刚学会化妆，一身时髦打扮回家，揣着“想让大家看我是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的小心思。和爸爸一起回家的路上遇见牧民，牧民用不甚流利的汉语问，你是他的女儿吗？

塔娜说是的。牧民说，他也有个女儿，“我的女儿是草原上的一匹野马。”

这句话一下子把塔娜震住了。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有羞愧，有反思，总之，“他把我给弄醒了。”

无论她自己还是张全胜，都会直言不讳地回忆那时的塔娜“唱歌很难听”。塔娜第一次试音时，张全胜亦毫不犹豫地在心里划下了否定线。好在因为文字美，塔娜作为 HAYA 的文案留了下来。

那时陈希博作为张全胜的马头琴学生也已是 HAYA 一员，宝音则是鼓手和呼麦手，手上无时无刻不打着节奏。他们总爱玩即兴，感觉来了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加入。

“我记得在录专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都泡在录音棚里边，我就在那里跟大家一起，我听他们在玩音乐。玩到后半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就像一杯水一直在摇它，它是浑的，可是越到了晚上它越来越沉淀下来的时候，大家开始进入一种即兴的状态，全胜老师弹着吉他，有人在打着鼓，他就这样唱起来：‘月光下——’”

于是塔娜就回应道：“鲜花在盛开，故事在，风中流淌——”

这后半夜自然流淌出的女声空灵，像高空流水，声音悠远又干净。塔娜意识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声音，似乎回来了。

“等回过头来我们再听我们录下来的小样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喜。全胜老师说，‘原来我一直在找的歌手，她就在我的身边。’”

但 HAYA 的发展并不顺利。数次演出受挫，因为各种各样奇怪的原因，比如没打点剧院负责人、调好的音响灯光上台时突然初始化、电视台摄像镜头永远切不到正在演奏的乐手……张全胜用“狼狈”形容当时的 HAYA。为了宣传，他自掏腰包带着乐队参加各种音乐节，但最终依旧抵不过生活压力，好几位成员陆续退出，养孩子得回老家的、付不起房租去日本打工的、转而参加其他乐队的……最后，留下的只有张全胜、陈希博和黛青塔娜。

那是 2008 年，北京正在办奥运会，整个城市都处在一种沸腾、欢乐的节日气氛里，但热闹是他们的，张全胜只感到孤独。他和希博、塔娜坐在车里，一路上放着 HAYA 的歌，张全胜想，这么好的歌，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呢？为什么就这么艰难呢？

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操场上，他们走了一圈又一圈，看着天边的夕阳，张全胜说：

“我们录一张专辑吧，我们就叫《寂静的天空》。”

安静与躁动

12 年过去，HAYA 乐团登上了《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舞台。

曾经，在张全胜租来的那个 30 平小房里，在邻居敲暖气管跺脚表示抗议的一个个深夜里，《寂静的天空》诞生，成了 HAYA 流传最广的一首歌。后来张全胜和黛青塔娜成了夫妻，乐队好几位成员的家庭都迎来新生命，HAYA 又出了六张专辑，风格却绝不停留于安静——从《灯》《迁徙》《疯马》到《Link》，里面有伤痛，有癫狂，有悲悯，有天地苍凉，也有生命的欣喜……

现在，为了决定《乐队的夏天 2》第一场亮相究竟该唱什么歌，HAYA 开始了一轮内部投票。

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投给了《寂静的天空》——除了黛青塔娜。

首秀会决定观众的第一印象，《寂静的天空》唯美安静，黛青塔娜却觉得那不是她最想展现的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她是“荡来荡去的”，“一会儿在山上，一会儿在谷底。”当下的她恰巧是波动的，不是“寂静的天空”。

再选一次。商量来讨论去，2019 新专辑同名歌《Link》成了最终曲目，但黛青塔娜还在犹豫。《乐夏》毕竟是一场比赛，从旋律到歌词，每个部分都要拿出来重新审视，但《Link》的英文歌词当初是朋友写的，并没有完全长在她心里。该还的总得还，她决定重新写。

一向习惯等待灵感降临的黛青塔娜少有地感到了紧迫。连着好几天，她一大早就把自己关进录音棚。张全胜喊她吃饭，她看也不看，把手一拦：“别打扰我，出去！把饭搁门口。”

只有黛青塔娜自己知道她在干什么。不开灯，屋内一点点光，自己一个人光脚待着，一天半瓶酒咚咚咚地灌下去。酒要喝到正正好，不能多也不能少，喝到整个人状态松弛神经活跃但身体尚可掌控时。不能听原曲，但可以听点别的音乐，为的是不被固有的东西牵着走，“不能应付，要给这个歌一个重新的定义。”

大概熬了一礼拜，闭关的最后半小时，黛青塔娜彻底兴奋：“我写出来词了！”下楼给全胜一念，全胜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心想：成了，这个事应该是可以成了。

黛青塔娜把这个闭关的过程视为“跟自己相处”。这些年里她总在找自我——失落找回是反复的过程，找到了安静的 A 面不够，还需要她释放狂野的 B 面。《寂静的天空》后，为了录更有力量感的新专辑《迁徙》，张全胜把当时还不太放得开的黛青塔娜带到学校操场主席台上，说，你就在这练。操场上有不少跑步锻炼的人、上体育课的大学生，塔娜扭捏着说自己不好意思，心里想的是张全胜简直疯了。

张全胜不管，站在台下给塔娜录视频。他



知道日本有一种超市销售，就是要站在大街上使劲喊，把他人的眼光都忘掉，只去尽力表达自己，“这时候你才能冲破自己内心的束缚。”

塔娜的 B 面确实越来越好。而和来自不同国家、族群的朋友们一起玩音乐的过程，也让她、让 HAYA 的每个人都越来越放松。他们和朋友的聚会常常会变成一场世界音乐的狂欢——就在不久前，他们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一家普通的火锅店里聚餐，朋友们分别来自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非洲、以色列，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乐器。一说要即兴表演，一开始还是你推我让规规矩矩，结果酒越喝越多，喝到最后屋子里各种乐器歌声轰隆作响。

“有一个苗族小伙是吹芦笙的，但那天没带，听到音乐的时候，贼着急贼兴奋，一直在唱歌，唱他自己苗语的调。前面大家还让一让，到最后实在争不过了，直接冲到前面开始喝啤酒，到后面就已经倒立了。”

说起那倒立的苗族小伙，HAYA 所有人都



HAYA乐团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舞台上
图/受访者提供

哄然大笑起来，争着表演那男孩倒而立面红耳赤的样子。

某种程度上，这也越来越接近黛青塔娜内在自我的释放。“我总是内心有一种想要喊出来的声音，这个东西一直还没有消失，我不想把它藏起来。”

迁徙与呐喊

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乐队的夏天》选歌时，第一首在黛青塔娜心里浮现出来的，其实是《迁徙》。

《迁徙》的尾声，是一声似要撕破天空的嘶鸣，紧接着一片空寂，再慢慢响起马头琴的无奈与沉默。有乐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现场时，形容自己直接听傻了，“灵魂好像被震了出来。”

第一次为这首歌写注解时，黛青塔娜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候鸟迁徙，为了生命的呼吸，候鸟迁徙，为了生命的延续，牧人迁徙，为了天地的生生不息。我们迁徙要向着何方？当山崩裂出疼痛的伤口，大地露出他黑色的血液，这凝固的土地刺痛了双脚。是什么唤醒了我们毁灭的力量？是什么让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满足？”

“迁徙是什么，我的祖先千百年都在迁徙，他们像山一样沉默，像草一样谦卑，像鹰一样自由。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和这个世界一起走向了荒漠。”

音乐中的 HAYA 像是与这个世界同频，疼痛和紧促，悲伤与喜乐，俱是一体。黛青塔娜已经完全学会用自己的方法发声，曾经那些让她无比排斥的西方发声方法，也开始为她所用。她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每天早上，她会点上从家乡带来的柏香，拿到楼顶，让缭绕的烟气一直升到天上，然后吹海螺，祈祷，念经。整个乐队上台前，他们也会习惯性地敬地敬祖先，塔娜照例祈祷、燃香，所有人把状态沉下来，以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进入全然忘我的舞台状态。

然而从十年前那个堵在长安街上的灵感开始，这十年间，这歌的疼痛感没有减轻半分：他们看到的是油田一直在蔓延，煤矿一直在蔓延，大山一直在崩塌，土地一直在裂开，山上的树一直在枯萎。宝音找不见自己出生的家了，土地秃了，蓝顶红瓦的水泥房一模一样，到处都是钢丝网，他再也不愿回那个地方；穆热阿勒老家的牧民亲戚多半放弃了放牧，转做农民或以其他方式谋生，开始买车，他自己也成了草原的游客，草原上甚至可以吃到 80 元一碗的过油肉拌面……

后来黛青塔娜重新填了《迁徙》的中文词，她在里面问：“是谁啊是谁，是谁让大地露出黑色的血液？”

“嘿，有你啊，有我。”

（参考资料：一席纪录片《哈雅的图腾》）



《日本沉没 2020》一部被简化的献礼片

文 **陈晓书**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日本动画导演汤浅政明近年来颇引人注目，他先是自编自导动画电视剧《乒乓》，又接连执导了口碑动画电影《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动画电视剧《恶魔人》等，其作品的诡谲画风与卓越分镜在日本动画界早已独树一帜。

去年，当汤浅政明担任网飞出品的《日本沉没 2020》导演的消息公布后，许多小说原著迷和动漫迷都分外期待。小松左京写作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在 1973 年出版后曾掀起一阵灾难与末日题材的热潮，同年上映的同名改编电影也成为了日本灾难电影潮的先驱者，而刘慈欣的《三体》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影响。

备受期待的《日本沉没 2020》在今年 7 月播出以来，观众反馈以失望居多，这部剧向观众展示了另一种汤浅政明的可能：一位天马行空的优秀导演是如何被题材和“政治正确”所束缚的。

在这部十集的动画电视剧中，素以驰骋天际的想象力而闻名的汤浅政明像被束住了手脚，以往他被人称赞的独特美学风格，在这部动画里称得上作画崩坏。尤其从第三集开始，许多画面粗糙得像还未完成清线的原画草稿，糟糕到了让观众出戏的地步。坦白说，最后几集已经难看到了使得坂本龙一写的片头曲都不再好听的地步。

前两集，观众凭着对汤浅政明以往作品的信任与期待耐着性子看，还能看到对被破坏的城市景观的精心刻画，越

往后，整部片子越像是一部强行国际化的公路片，导演在剧情编排上采用类似公路电影不停移动的形式，人们在公路上相遇、又有人相继死去。

此前，汤浅政明曾表示过如果模仿电影《2012》中建筑物不断下沉的画面，制作难度将很高，所以他选择了用更贴近一部分人群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但是真的有关于“人”的故事吗？几乎每位登场角色都以符号化的面孔出现，他们分工明确，在性别、国籍以及价值观上都力求均衡——日本人、双重国籍的人、来自海外的人、对日本持不同态度的外国人、对外国人持不同态度的日本人等。

在原定于日本举办奥运会的 2020 年，这部备受期待的国际合作动画片像是一部强行的奥运献礼片，近乎机械化的角色设置、经常突兀出现的英语对白、强行开展的国际交流与融合，都使它更像一场通过报国名来进行谄媚的强迫推销，这和“日本沉没”看起来没有一丁点关系。



《日本沉没》所创造的伟大与日本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经济膨胀后的日本物价不稳定和资源危机等问题异常明显，作者用一个“所有日本人都无家可归”的故事，将日本民众的过分自律而压抑不安的内心情绪折射了出来。这是一个关于末日与绝境的直面丑恶的故事，也是一个通过揭露人心的阴暗而抚慰人心的故事。

去年的一个深夜，汤浅政明突然发了一条推特：I'm so tired。许多影迷给他留言安慰，没过多久他就删了那条动态。我不知道这与如此糟糕的《日本沉没 2020》是否有关。许多观众都清楚一点，小说改编成动画电视剧或动画电影，难免出现扁平化、简单化的特征，但如果对一部优秀作品的改编已经颠覆了原有的内核，那何必要改编呢？



罗霈颖

生要尽欢

文 柳浪 /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2020 年 8 月 3 日晚间，罗霈颖被发现在台北八德路家中去世，离她 60 岁生日还有 9 天。

2005 年，罗璧玲改名罗霈颖。因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她收获了观众持续 15 年的喜爱，金句“我就是豪门，干嘛要嫁入豪门”流传至今。早在电视尚未进入千家万户的年代，罗霈颖已在娱乐圈打拼多年。她因电视剧《再爱我一次》走红，在 1980 年代的台湾影视剧中留下了青涩的面容与演技。台湾房地产飞速发展时期，她是当仁不让的“工地秀女王”，超过 1000 场工地秀让她完成了早年财富积累。



罗霈颖（1960–2020）
台湾，演员、主持人

她曾在多档节目中坦陈一生起落：两次失败投资让她血本无归，几次情伤带来身心折磨。言谈中，她眉眼敞亮，话语坦荡，描述时亦庄亦谐。痛苦被她所呈现的生活态度消解，她的形象因她的讲述而丰满且具有张力：一位生于台湾书香世家、备受家人宠爱的小姐，经历了少年叛逆、爱情失意、财务崩塌后，选择以昂扬的态度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

罗霈颖集恩宠而生，是家中的幼女，从小被父母兄长疼爱。她是学校的模范生，也是校花，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情书。初中，她进入青春叛逆期，开始交男朋友，时常翘课，没考上大学，去了一个基督学院，三个月的课逃了两个月。同时，她去酒吧打工，也兼职当平面模特，机缘巧合被请去给电视节目伴舞，被父亲发现，挨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巴掌。她气极离家，六年没有和家人联络。

为了负担生活，罗霈颖开始在餐厅打工，也当过秘书。友人找她拍广告，她被台湾制作人周游挖掘，拍了电视剧《神勇娇娃》，由此进入影视行业。尽管她确实是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亲历者，但在经典作品不断出现的上世纪 80 年代，她的面目仅留存于杨德昌作品《海滩的一天》中一段不到 30 秒的客串。

接拍《再爱我一次》后，罗霈颖知名度达到顶峰。她开始参与秀场的演出并接下红极一时的节目《黄金拍档》的主持工作。她为生计打拼不遗余力，为了主持，故意把嗓子叫破，以告别当时不受欢迎的娇嗔口音。在工地唱歌时，固定衣服需要绑鱼线，一场秀下来，她的后背上全是创可贴。一年 365 天，每年年底她就知道明年的 365 天自己在哪里。

罗霈颖从不掩饰对美的渴望与对衰老的恐惧，挚友于美人称：“她每天洗澡完后，全身保养要一个多小时。”罗霈颖定期打肉毒杆菌，头、眉心、眼周皆有填充。鼻



知识的海洋浩若星辰
鱼跃于天，星沉大海

The sea of knowledge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己任，旨在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报道人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创刊十余年，已成长为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家庭读物的首选期刊。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南周订阅　邮政订阅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亲友展示罗霈颖旧照

子早就做好，法令纹不断修复。“我不用化妆，擦擦口红人就很精神。”在《康熙来了》卸妆单元，她素颜与卸妆前差别甚小：“睫毛是种好的，眉毛是纹好的。很多人问我怎么保养的，还不是钱堆出来的。一年下来没有三五百万是摆不平的。”她早早在上海置业，钟意小区内的池塘与游泳池，习惯穿着慢跑鞋和运动衣绕池塘跑或慢走，到了有风吹动、泳池波浪翻涌的时候，她亦会着衫畅游。医美让她的面容始终保持紧致，锻炼令她的身材维持年轻时的苗条。在 2019 年的一次采访中，她对着镜头展现自己的身材，“开心就会年轻，这个年纪穿成这样子，你敢吗？我敢。”

财富成为昂扬底气的一部分，两次投资失败后，她将赚到的钱用于买房，拥有多套房产，身家超过 4 亿新台币。婚姻成为罗霈颖一生渴求而终未得的遗憾，“老天爷几乎给了我全世界我该有的东西，但有时候很玄，我得到很好的名和利，所以没有好的男人爱我。”她的择偶观因此受到影响，她坚信“丑的也要偷人，帅的也要偷人，不如选个帅的，看得开心”。40 岁之后，交往的男友都是 25 岁，她如此描述与这些人的感情：“每一年都有小朋友长大，每一年都有小朋友喜欢大姐姐，喜欢不一定在一起，这些人都是过客。”

2019 年，罗霈颖将媒体带进了她在上海的家。她喜欢自己的浴缸，冬天的早上，从夜店回家，放满一缸热水，在里面泡着喝牛奶，看窗外雨雪绵绵，再起身睡到天黑，“这是最大的享受。”她的厨房器皿齐全，摆放整齐，刀用最好的，各种各样的炖锅大部分都空着，七八千台币的铲子放在厨房不能用只能看。一个柜子装满了零食，满抽屉的零嘴提供酸甜苦辣，陪她度过漫漫长夜。

当罗霈颖的人生经历通过综艺节目传到两岸三地，一个果敢的、历经岁月磨练的资深艺人形象立在荧屏中。她身上带着闯荡江湖的侠气、出身世家的贵气与少有流露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少女气。她用 59 年的人生呈现了一部独立女性的成长史，亦为世界提供了一份生存样本。尽管遗憾，但她已尽欢。

WEEKLY

周末清单

轻松一夏，嗨玩周末



抢先价

¥79

扫码立购

周南末才